

夜生生活

★ 第十二年報紙生涯甘苦錄 ★



★ 卷一 ★

贈閱

獨立出版社印行

夜 生 活

——二十年雜誌生涯甘苦錄——

魯 莽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以此書紀念亡友西京日報創辦人丘元武

—魯莽—

序

一般人多說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但新聞記者自身很少同意這種看法，三十年來跟我熟識的報人，也沒有一個不是叫苦連天的「逼得燃眉苦吃狼狽過行」的關係。實際上新聞記者的辛苦，絕不是外人所想像的「新聞學傑作出新聞說策的簡樸者趙建新君在這部傑作的自序上說：『十年記者的我，天天亮眼向夜校校義的生活，中筆墨勞復遊餘地，偶爾會想到這一枝秃筆能權權有軍不盡，油盡而報用在不筆筆生活壓抑精神，善烟鏡同業中也有有三點，仍須編電報，用更猶未上關，各處邊境，此的履行，請閱新聞記者的犧牲活，實在是一種特殊的生活。』不過從前檢閱一種價值來看，顯露記者也有他特別的興趣，那是要看時代環境和你的體力精神了。總之，新聞記者的生活是值得記錄和發表的。中國新聞記者老幼的，目前也不計其數，他們自然瞭解自問，他們的關切，並從明瞭，這與他們的景

MB
G639.29
245
2



3 1762 1820 8

江蘇省立南京女子中學二十一週年紀念刊目錄 二十二年五月編印

(一) 引言

(二) 全體照相

(三) 論文

1	本校二十一週年紀念感言	游慶荷
2	前題	吳蘭芬
3	前題	金文和
4	南京女中的生命	孫靜逸
5	南京女中的壽辰	孫繼孝
6	我愛的女中	金瑞莘
7	南京女中的生命	章蕙英
8	我愛的南京女中	朱文淵
9	本校二十一週年紀念感言	張淑賢
10	從二十一週年紀念說到我們的責任	沈漪秋
11	歷史是什麼及其他	錢卓升
12	糞貼別解	陶焜民

目 錄

引 言

陶 玄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爲本校創校二十一週年紀念日，經校務會議決議出一冊紀念刊，交出版委員會同學生自治會幹事會擬定辦法，所有編印事宜，由出版委員會主持辦理。

去年五月出過一冊一覽，以二十年度狀況爲經，以過去史料爲緯，把牠當作一面未來改進底鏡子。因爲舊有文卷散佚很多，過去史料缺乏，想下次編輯紀念刊時補充。可是，有許多材料，現在依然無法搜羅，不得已暫留闕憾。

本刊編輯底原則，顧名思義，應該把過去二十一年底情形和事實加以整理作一總報告而包含一種希望底意味。然而辦不到，只好仍以二十一年度狀況爲主，而很熱烈地表示出回憶和希望底情緒來。所以本刊變爲繼承一覽而作，凡一覽裏已經記載而在本年度內沒有變動的，除同學錄外不再贅列以免重複。

本年度內關於學校基本的惟一大事，爲上學期開始時本省教育廳頒的教訓合一制。本校遵照廳令擬定詳細辦法實施，所以訓育方面改變獨多；其他校務行政，量力進行

，和二十年度並無什麼特異之處。

引 言

二

人類到二十一歲，是一個成年的青年了；一切學問和事功底基礎已經立定，以後逐漸展佈，到老年而衰止。但，學校是一個集團；她底分子，新陳遞禪，永遠不會有老年，由分子繼續着維持她青年底精神體魄。本校二十一年來自幼而長，雖說也有點相當成績，但基礎還未完全立定哩，維持和光大底責任，在現在和未來底分子肩上；尤其是現在分子——我們，繼往開來，責任格外重大。「吾願無盡，吾行無盡。」這個觀念，在紀念日特別提一提，也就是本刊底第一含義，請教職員同人和同學大家注意！

嚮訓直爽，在這種不顯赫的性情，可以說，他是舊時時代所變的影響。——非的工計。而從
中學畢業有年，業近有一備做買賣的機會，請謝先生先往接洽，因結與錢銀，謝先生一舉兩得
的石印，業近有一介紹要我做民報，謝先生一舉兩得，木稿，謝先生一打，在稿末，編輯先生見稿
即用五元，既後缺條，即得稿費五元。於是我就在課後到於進來，想表跑，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就寫給一條社會新聞，自謝先生到報館，且而報館也居然採納，於是發給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清惠為鑒，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聲明，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被施派，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學監，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邊，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刻因，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身親，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謝先生一打，

第二章 謝專員的醜美

世對於玩報，也從此灰心，欲求其回。又大歐戰開，世說：愈無報可看，其結果不
能前進中學，適值五四時代，在重新估計一切的日子下，二種大變局所謂「學風」也變
得可觀，甚而至於可怕。我年級雖低，大凡新的活動樣樣參加，學生會自治會的宣傳工
作，由我包辦，會刊的編輯當然屬我，於是開始和排字工人接近，而一切編輯上的術語，
印刷所的內容也就明瞭了。除辦會報校刊而外，又替紹興的三家報紙寫新聞，編輯刊，雖然
是一個低年級的中學生，與本地名流經常往來，頗感榮耀，重所謂名流就是各報的主筆編輯
先生，這些人在紹興大都是詩文並茂，落拓不羈的人物，此外則向上海的「白話詩」
先生等投稿，在越鐸日報副刊上，並且每天發表一番，現在想起來低能萬分的「白話詩」
那時正是劉大白先生辭職來教員。這種低能行為，不但未遭斥責，而且獎掖有加，
而當編輯投稿的權，不在此已足。於是又轉到「一學校」的路上去了。後來，
中學畢業，到上海滬大，繼續於「自由上海報紙」的規模，避開黨進雜誌參觀，又兼贊助
「一報」兼兼各條線，本以為滿心滿意，可是仍想漸漸地，起初並沒有參加任何一報的工作。直到



論 文

本校二十一年紀念感言

普二蔣慶荷

二十一年紀念日快到了；學校的孩子們，對於這母親的生日，當然感覺到特別興趣；同時我們對於這重大的紀念典禮，充滿了熱烈的希望和興奮。在這裏，更不能不使我們連想到學校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過去，雖已成了已往的事實；但，回憶也是一件人類必然的情事；並且，我們正可以過去的事實為我們前車之鑑。過去的學校；是多麼不幸呵！——爲了種種關係，也許是學生的盲目，忘却了讀書的責任；專門從事於搗亂，曾幾次使學校停課，學生休業。我們知道：這樣的舉動，完全是少數不合善意的分子引起的。換句話說，他們——少數人的鬧風潮，就是想停課休業，懶得上課，借此混日子。這種無謂的事，影響于我們學校的過去很大。我敢武

論 文



真是幼稚可笑。

到濟南後，丘君即轉膠濟車去青島，我則籌備出版。當時因機件字架子裝置已妥當，廣告發行及事務也大致佈置完畢，我只把電報通訊稿圖書資料以及聘請編輯採訪這些事處理一番，就開始出報。民國日報是兩大張的報紙，新聞副刊佔面積五分之三，廣告佔五分之一，編輯方面要開兩人，本市一人，副刊一人，以後另開一叫做「大明湖」的趣味的副刊，由我自兼，於是我又做社論又校稿件，還兼編第二副刊，因為只是兩張的報也並不覺得苦，而且我還兼了教育學院，省立高中，一女師等好幾個學校的功課，何冰如李江秋王志新諸君幫忙採訪，魏崇陽，錢滄頌，章××諸君供給日本上海漢口幾個地方的通訊，新聞上顯見得比當地其他幾家報紙要豐富些，因為機件新，字新，墨好，紙好，似乎格外出色。幾星期後，大受濟南及山東各縣閱報人的歡迎。又因為日本朝鮮東三省魯籍人士之多，所以在上述各處的銷路也打開了。我還寫信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買了許多印書用的細紙邊，作我「大明湖」副刊之用，現在想來真是浪費，可是錦上添花以後，却也引起一般讀

者的愉快。出報兩個月後，又增加了畫報一種，用高磅道林紙影印，商埠有一家真光電影院供給我許多好萊塢電影明星的銅版，於是這畫報宛如上海的時報畫刊，風行一時，後因遭人反對作罷。

濟南的報，截稿很早，我每天兩點鐘看了大樣就睡覺，後來因為早晨要上課，看大樣一事往往委之於要聞編輯王尊山君，王君比我仔細，由他看大樣，正好，於是睡覺的時間也提早了。我的臥室鄰近編輯部，萬一有要事，總由一個姓李的矮子當差輕輕地來喊我，還不至於誤事。我在民國日報時代的生活，可以說十分舒服，但當時却不知道。每天七時起身，早飯後坐着報社供給的一輛精緻的包車到各處上課或參加會議，中午回館吃飯，下午不是看書便同編輯部幾位朋友到大明湖釣突泉一類地方去遊玩，濟南地方比重慶自然要好。戶戶桃花，處處甘泉（濟南人家院中多植夾竹桃），又有大明千佛龍洞之勝，可是總不及杭州南京，所以我常覺得平淡，幸虧天緣好，結交了許多朋友，像省黨部的劉連濤，教育廳的何仙槎諸君，經常往來，談談笑笑，足以解我孤客生涯之悶，教育界中的南方人如

彭百川、王書林、董秋芳諸君，也很談得來。我很少去電影院，因為影片太落後，經常映出「火燒紅蓮寺」一類的無聊影片。京戲亦不佳，縱然各戲院照例每月送「長期優待券」來，只作爲慰勞工人的禮品罷了。我又不曾打牌，娛樂方面，可謂全部停止，有時在館吃晚飯，有時趕飯局，濟南的應酬也大，當時的地方政治，一切還在過渡時代，所以一些新穿時髦外衣的官吏軍人，故態未改，喜歡請客應酬，招待新聞記者，尤其是一件時髦的舉動，每次招待，又照例有演說報告這一類的文章，而致答詞，同業中往往推我代表，於是我的藍青官話也常見諸交際場中，可是年少氣盛，缺乏休養，常常喜歡作不客氣的批評，自己以爲這是在作宣傳工作，却無形中得罪了好些人。

記得一個盤踞在膠東多年的軍閥劉珍年，因當局的強制調防，不得已把部隊調到魯西，他自己已經過濟南帶着參謀副官一大羣人住下濟南賓館，對省垣做了一番不得已的應酬，同時還招待「次新聞記者」，記者們震於此公大名，幾乎全體出席，把一家番菜館的房間擠得滿滿的，那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不會演說，由參謀長代講話，答辭照例又屬於我，我因

爲從小痛惡此人，一時感情衝動，運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以師長的口吻，切切實實地教訓了他一頓，幸虧修辭還漂亮，他自己當時不十分明白我的意味，參謀祕書之流都色面面相覷，同業中人也異常驚訝，參謀長不敢當場發作，究竟因爲匪軍的勢力已在整個的壓力之下，又知道我是南京去的人，在答辭中萬分隱忍，第二天有人來談，他們當晚在濟南賓館開會，當此人知道了我話中的意味後十分忿怒，認爲是軍事與政治的雙重壓迫，當時有人主張，用手槍對付，劉某也贊成，終因我的政治環境比九年後丘元武君在西安時要好，他們的大軍在魯西重重壓迫之下，那位小鬍子的參謀長反對此種行勳，教訓之議作罷。可是這消息已嚇壞了編輯部中的幾位南方朋友，一致勸告我以後說話不可順性，以後我碰到這些聚會，素與不講話，推省政府的機關報國民新聞的龔長斧君說話，他雖是個湖南人，說話却非常和平。到十九年中原大戰中此匪部終究被中央軍解決，此匪首也正了法，就不知小鬍子參謀長結果如何？

我在報館是一個人吃飯的，那是仲舒的優待，因爲經理編輯兩部同事以及全體工人都

吃餛飩小米稀飯，仲舒知道我沒有在北方生活過，所以特地叮囑庶務買了大米替我煮飯，每頓兩菜一湯，菜總是抄雞蛋四季豆抄肉片等，久吃也膩。初到時，用藍花本地粗碗，我在副刊「千佛山下」小品中寫了一段「藍花大飯碗」，引起經理部的誤會，以爲我在諷刺事務人員，趕快替我買了一套江西磁的細碗，其實我因生長南方，一切奢侈慣了，對於不同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反應，不覺記之於筆罷了。此段小文幾天後又得了另外一個結果，郵局送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南京女友特地在承恩市定燒的一對細瓷箸款飯碗，真不安心，爲了幾個字，勞師動衆，一至於此，而我生活的拘泥性也可想而知。半夜裏的稀飯很好，夏秋是綠豆稀飯加淡饅頭，冬天是純稀飯，鹹菜也豐富，我因拙於吃稀飯必須肉鬆，醬菜，松花蛋等的習慣，對於這些鹹蘿蔔乾，葫蘆菜嫌不够可口，幸虧從小最喜歡吃糖，而稀飯碰到糖也最易流入喉管，所以吃粥用糖，吃淡饅頭也用糖。我一向有個癩病，不肯在衣食住行上用點心思，其實買些罐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沒有這習慣，在病方的生活，完全由於環境奢侈，到樸實的北方也就改了觀。這性格到現在還保持，除知

這進好的館子。點好的菜，上有好菜的朋友家打游擊，在飯廳裏從不知道加菜或是帶私菜這回事，正如家裏不寄新襪來，永遠穿着破襪一樣的不能自治。

吃半夜稀飯是報人戲子等夜工作者特有的享受，普通人不知道，那些看戲打牌者的「宵夜」，因為不是經常的事，情形又不同。編輯房裏吃過這頓稀飯，肚子既飽，又到了後半夜，精神轉旺，議論也就紛紛了，議論的題材多數以當夜所得的重要電訊為根據，也有把白天所見所聞的指出報告和討論，這時候大都稿件已完，編輯只等看樣，校對只等看二機，所以多數比較空些，而好吸煙的此時吸煙似乎更是名正言順，編輯部中往往香煙繚繞，令人眼迷，我的社評因作題材的重要電訊到較遲，常被稀飯停頓，有時一面吃一面想，亦是辦法：有時則妨礙交稿時間，好在千字左右四號字的短評，檢字也還不算費時，排社評的手民，是工房中第一流人物，不但快，錯字也少，有時交稿遲了，那個大個子領班，親自跑來索稿。

我的社評大致如當時其他黨報差不多，很敢說話，那時的報紙不受檢查，各報依照自

己的立場態度決定言論，新聞的方針，可以說很自由。却沒有一報不擁護政府，鞏固中樞，黨報固然不必說，非黨報的態度也很好。在擁護政府實現三民主義的大原則下，非黨報固然可以隨時向政府作施政上重要的建議，卽黨報亦可自由指摘朝政。輿論的作用原是在執政者目耳不及之處，以照明燈的資格，照明黑暗，使當局注意，知所改進，輿論並非完全是政府的宣傳工具，所謂「黨報」，他一面固然負有宣揚主義，解釋政綱的宣傳責任，一面也負有代表黨與民衆督促政府的輿論使命，如果把黨報看做專門替國民黨或是替國民黨的政府說好話，專做門面的宣傳工具的話，那就是錯了，所以我當時主持的雖係黨報，言論方針，除大原則外，絕對保持輿論家的固有態度，政庶施政上的錯誤，以及不肯的官吏，毫不客氣的予以批評和指摘，因此山東人民對於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爲滿意，中央方面也從來沒有因爲我批評錯誤的施政，攻擊不肯的官吏予以訓斥的，我個人亦以中央能愛護革命黨的個性和新聞記者的立場，深感黨的偉大。在戰時，我們自然主張新聞須經過嚴格的檢查，因爲於戰局關係太大，世界上也沒有一國不在戰時實施新聞檢查，不過檢查

仍然要有個原則和範圍，譬如關於物價高漲和攻擊囤積的新聞評論，實在不應該干涉，物價高漲固然也可作為敵方的反宣傳材料，不過物價高漲是市場的公開事實，人人知道，無法秘密，跟飛機失事，要蓋建築，貨幣發行額，軍火生產量一類情形不同，用不到檢扣。囤積居奇的揭發，固然是民德敗壞，官箴失常的醜事，却亦無掩飾必要，不但欲蓋彌彰，而且惡毒攻心，政治更不堪聞問，倒是讓報紙盡量揭發，盡量指摘，使害羣之馬，知所畏懼，而負有平抑責任的也不得不努力。

我還記得在民國日報時代，山東有好些貪官污吏，都是由於嚴厲的輿論，獲得制裁結果的。當我們對於省會官吏或是各縣地方官吏獲有不法的真憑實據時，我們馬上把詳情披露，同時在評論上口誅筆伐，這一份報寄到全省，就激起了全省的輿情，各縣縣黨部，合法民衆團體，紛紛通電聲討，同時向省黨部告發，省黨部便把電報移送省政府，省政府鑒於黨員民衆的忿慨，關係最深的人，也不敢不辦，光是縣長一種，先後因為報紙的揭發指摘去職查辦的就有十幾個，政府當局從不敢以壓力隨便施諸輿論，誰能保證在此大時代中

沒有混水撈魚的公務敗類，但誰又看見先由輿論揭發的公務罪惡？一切醜行都在有關政府信譽的大帽子上遮掩住了，成爲一切公務員都是聖人君子的大時代，其實我們擁護的是政府，是費勞的政府人員，不是貪官污吏，如果參加囤積居奇的，括地皮，擾民害民的公務人員，我們不但不應遮醜，而且爲了愛護政府，樹立政府的信譽尤其應該盡量揭發，使政府以後用人謹慎，官吏知所警戒，毒蛇在手，壯士尚且要斷腕，政府如同一盞蒙有灰塵的燈，輿論是把刷子，貪污是燈上的灰塵，刷子把灰塵刷去，使燈格外光明，充分發揮他的作用，刷子應盡此責任，燈也應該感謝刷子，現在的情況，刷子不盡責，燈不嫌黯淡，結果是費電多而效力少，一些刷子，在桌子上擺着成爲裝飾品，實在是一種反常的現狀。我還記得當時有兩位高等法院的院長，也在我這種越鑼日報罵王金發的姿態下受着輿論的裁判，第一位吸鴉片，給我們發覺了，責備他知法犯法，他祇好掛冠而去，第二位縱釋在押的政治犯，也使人不滿，因而使他受到輿論的抨擊，如果在現在的解釋，司法尊嚴，更是碰也碰不得，但是進步的國家像美國這樣，司法人員以及神父牧師一類尊嚴的人物，他自

已奇毀棄了尊嚴，輿論也決不保護他的尊嚴。因為民族的尊嚴國家的尊嚴比個人的尊嚴更應嚴重，何況個人？如果自己毀棄了尊嚴，根本就不必顧到他所操何業，所居何位，應該爲了國家毫不留情地予以剷治才是。

可是這種毫不留情的工作，自然也會引起強大的反感的，因為運用輿論的威力太多了，有些人着實感到頭痛。於是到了十九年夏天，由於中原內戰的關係，省會警察局藉口軍事時期，通知各報一律送檢。民國日報覆稱：「中央直轄黨報，不能受此限制」。警察局檢查新聞的目的，原是在對待民國日報，今見狡計不售，乃由省政府出面控告於行政院，行政院以茲專體大挾原文轉呈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以事關黨的宣傳，咨請政治會議轉中央常會核辦，中常會的答覆是：「戒嚴區域得檢查當地報紙，惟中央直轄者仍由中央指導」，警察局碰了一鼻子灰了事。

關於社評，還有二件趣事可談。我在民國日報一年多所做的社評，論人論事，都是些轉理批評的文字，在技巧上沒有什麼趣味。祇是出版不久的一子見苗子」二篇文字，較爲

類頗有趣，引起不少人的賞玩。泰安一個中學校的學生，在當地上演一個林語堂編的叫作「子見子南」的話劇，大胆地描寫了孔子看見南子時的色情場面，引起當地聖賢及士紳的強烈反感，除向省府教廳控告外，並且向南京控告，偏偏省黨部辦的一家叫做「山東黨報」的報紙，有一兩位「前進份子」又袒護學生，醜詆泰安士紳「不革命」，我實在看不過去，於是做了一篇長文章批評這件事，我第一部份全引孔子的話解釋兩性問題之平凡，結論是：「飲食男女既是人之大慾，聖人亦猶常人，聖人之好色，不足為怪，」證據是：「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路何以不悅，此中必有文章」，替泰安學生緩頰。第二部份批評這劇本的技术不高，而且不應在山東演出，這是消泰安士紳之氣。第三部份是批評山東黨報不敬佩孔子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之錯誤，結論是：「孔子為聖之時者，安知孔子生於此時，不為一般青年所推崇」，議論出於山東士紳不以我之肯定孔子愛悅南子為不敬，山東黨報却大罵我崇拜孔子為落伍。甚至說：「山東中央所辦報紙不專革命宣傳，竟乃鼓吹復古」我讀了這批評真是啼笑皆非，想不到五四時代「打倒孔夫子」的口號還盛行在孔老先生的故

鄉。不知是我落後，還是此君落伍？我祇有找主管的宣傳部長，說明國民黨決無倒孔的政綱，黨報言論如此荒謬，實令人駭異，那位離開「五四」不久的宣傳部長恍然大悟，把這位排孔前進份子開除了編輯職務，教廳也撤換了秦中校長，一場「不敬事件」宣告終結。

要是社評下得早，精神還好，就拿當天印好的「大明湖」做樣張，編輯第二副刊。「大明湖」的篇幅只有二分之一版，相當於現在中央日報的副刊，大約有四千五百字，全用短小的趣味性的稿件，最少有七八篇，而且不刊續稿，盡量利用花邊，使版面美觀，濟南各報副刊，前無此例，最初投稿的人很少，差不多由我一人製造，用各種各樣的化名，藉以顯示寫稿的多，後來稿件固然來了，有的寫得比我好得多，使我很開心，有吾道不孤之感。一位姓郭被稱為「鬼才」的朋友，賦閒了，對於「大明湖」發生興趣，願意無條件地代編此刊，我自然歡迎，可是編輯部名額有限。額外開支又限於預算，於是在稿費中每月划出四十元做他的薪水，他編且寫，四十元除繳飯錢外，每天還看他不斷地吸着紙煙，裏是現在，四十元一天的紙煙，也不够他抽。自他接編大明湖後，我又省了許多事。但不

似乎爾得難過，又替郭醒儂君編的『山東民國日報副刊』寫一篇『時代犧牲』的長篇小說，描寫一個在北伐中爲了新舊思想的衝突而犧牲的女子，寫得並不好，現在想起來更壞。可是據郭君談，對於這悲劇的結構，有好些人『迴腸盪氣』，是否是一種應酬話，我就不敢判斷了。

自『民權』完全刊載正統的新文藝、小說、詩、散文而外，不刊別的東西，那是郭君的主張。我對於所謂「純文藝」並無信仰，在「大明湖」未辦前，我常有些小品交他刊載，他總很勉強，究竟因爲我是總編輯，無法抗命，等我另闢「大明湖」，他才收復失地，金甌無缺。民副篇幅佔第二張三版全部，用書頁式排，每日單印若干，每月售單行本，因爲都是些新文藝界中的斗方名士的大作，生意還好，二十六年杭州淪陷後，我紹興家裏，大焚新書，除四書五經，韓柳歐蘇而外，凡洋裝平裝諸書，一律付之一炬，連我們姊妹各級學校的教課書，也不存一本，因爲教課書中的「反日」文字也不少。民國日報合訂本以及民副合訂本以及我自己認爲相當滿意的四大冊天津商報社論集，自然也光了，其實最可惜的還是五

四時代的各種雜誌，十三四五年國民黨的重要宣傳品以及幾千封女友的情書，這些我認爲都是一代文物，無價之寶，在圖書館中不齊，在黨史史料會中不齊。情書呢，反映「五四」「北伐」「統一」三個時代的青年思想與生活，也是研究文化史的好資料。如今和郭醒儂編的民副合訂本一律烏有了！

郭是山東人，在綏遠辦過報，常常稱道綏遠草原的肥沃，但他不灑脫，却不像一個馳騁草原沙漠的文人，他十分老誠拘謹，因此我無法跟他一起玩，他有時下帖子請我吃飯，光臨郭府時，却是一盤菜飽子，魯人的誠篤樸實，實在可以做我們江南人的模範，因此我自署「魯人」，希望改變作風。我性魯，我的身材高大像魯人，我的行爲性格除放逸揮霍外，也有些像魯人，因用此筆名，非常歡喜，在天津商報幾乎全部用這筆名。記得二十三年因爲跟彭百川郭有守諸君在京滬一帶推行教育電影而認識了聯華公司的一位青年導演費穆君，偶然談起天津，他知道我對天津很熟，問我在商報上常寫文章的「魯人」，熟不熟？我笑了一笑答覆他：「你大概沒有看見過他的面，否則你就不會問了」。他才知道

「魯人」是我的筆名，從此他跟我的感情很好，據他自己說那時在天津辦大光明電影院，每天讀我的文章，可謂稔交已久。

提到筆名，在像我這樣年齡的一輩人中，是最喜歡用筆名的，而且用得特別多，我個人自五四時代正式寫文章投稿起，到現在止，先後用過的筆名起碼在一百以上，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記得五四時代上海有一種「新人」雜誌，專談解放問題，我用乳名投了一篇主張女子剪髮的稿子，編輯誤會我是女性，把我這篇文章排在第一篇並加介紹文字，因為我的乳名很女性化，（那是我祖父爲了寶貝我，怕我長不大，特地用女孩子的名字給我）

「新人」的編者想藉此來號召剪髮運動，以符合「新人」的解放旨趣。後來響應的文章果然不少，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尤其可觀，先後幾乎有二十幾篇的響應文章，大半多是學生，而女子剪髮運動也就從此開展，剪髮也就從此實現，固然不能說是我的功勞，因爲我不首先提倡，過一些時也會有人出面提倡的，可是我究竟放了第一砲，我那篇文章，最大理由是衛生、節時、經濟，但我當時想不到剪了髮的摩登女子會幾個鐘頭地坐到理

髮店裏用電氣燙髮，更想不到一燙竟至兩三百元而危險迭出。「衛生」「節時」「經濟」三者何有哉？話又說回來了，剪髮運動的結果如何且不管，用化名而推動剪髮運動，却也是一件趣事。

濟南這地方就一般的華北言，有山有湖，家家泉水，處處垂楊，已經是傑出的城市，上過大明湖成爲幾條狹港，坐在龐大的畫舫中看污水，並不風雅；千佛山光頭顙額，又不高明；龍洞比較得好，路太遠。坐汽車，來回也非一天不能玩。論洞，又豈能比之於宜興之「善卷」「庚桑」，桂林之「七星」「龍隱」！連家鄉的「柯岩」，也比龍洞強得多。泉水固然好，只能喝與玩賞，却不能當風景遊覽；趵突泉，四邊賣茶賣唱，連玩賞也受了影響；黑虎，金線等雖可愛，可看也不過如此，譬如自己家裏的後花園，最好究竟範圍小，所以極想有個機會到青島去一趟，但總是被報務牽連，脫不得身，到濟三個月後，忽然有個去青島的機會，於是整裝而發。

丘君元武在青島發生人事問題，他的部下打急電來要我去調處，我因他自從離開濟南

錢，始終不給我信，很是生氣，後來介紹一位姓江的同學給他，連去五信，也得不到覆音，更覺此人胡鬧。在最後的信中有這樣的忿語：「同學是大家的，我不請托你，你也應該盡服務之責……」縱然無法可想，至少應該告訴我一聲……因此很想托故不去，以資報復，但爲了他的年紀比我小，又爲了他這次事情之嚴重，看在平時交誼上，也就按捺火氣，束裝就道。一上膠濟車，就發生好感，一切裝備管理都比當時其他國營鐵路優異，不過路軌比較得窄一些，車箱也小一些，都小得十分精緻，頭等車座，白天坐，晚上睡，絲絨坐墊，絲絨窗簾，煙斗疲孟風扇，樣樣比津浦平漢滬甯，連我以後所看到的北甯平綏等線好，路軌窄，據說是使車輛無法過軌，德國人的頭腦與能力，實在令人佩服。到青島，進入一個真正陌生的都市，青島整個是一個公園，沒有一幢建築相同的房屋，也沒有一家門口沒有樹木花草，那些商店的門上多半繞着開花的籐枝，最俗的市廳，點綴得異常雅緻，至少園內是找不到的，那怕是天堂般的蘇杭。

自然，海邊，公園，海水浴場，天文台，要塞區，更是美麗雄壯。那海水，就在青島

附近偏偏是獲得那麼可愛，這一點就真得像上海黃浦灘的黃了，從青島到天津途中，更有醜惡的黑水，青島天然是個美麗的海上公園。而況論氣候，偏偏夏季是那樣的涼爽，晚上總須蓋着薄被，早晨一層薄霧，迷漫在空中際，人們穿着整潔的衣服在路上走着，正如最好的花朝月夕似的。說到整潔，又不能不歸功於自然，華北地方那一處不飛着灰，偏偏青島是毫無灰沙，德國人築的馬路又那麼結實講究，絕無灰土的路，衣服那得不整潔。我是最不受擦皮鞋的，從濟南穿去的一雙皮鞋，在青島跑了一天，鞋面上的灰土一點也沒有。這這好的地方，又偏偏被德國人發現而加以整頓，成爲帝國主義海軍陸戰隊的清夏勝地，我們是大得糊塗，人家是白沾便宜。自然，當我玩青島的時候，已經由德國人轉到日本人手中又轉到我們自己手中了。可是青島，連膠濟路，連濟南，日本人的勢力處處存在，後來九一八事變中日本人公然在青島燒毀「青島民國日報」，青島當局毫無辦法，就是這證據。

在青島玩了三天，十分愉快，元武的人事問題，也有相當安排，第三天晚上就坐夜車回濟，到濟南，編輯部好幾個同事在站迎送，我很奇怪，原來青島的朋友送我上車以後，就開長途電話通知濟南報館說我首途回濟，他們就在土版後開談到天亮。同事小別，倍增情感，而我玩青島的癮也就從此染上，總計在濟一年另兩個月，先後却去過四五次，那時膠濟路局長是蘇人顏德慶君，所以有時自己破鈔，有時由他贈票。青島固然以夏季最宜，但其他季節也不壞，冬天是比較冷，但冷得並不使人難耐。記得有一次從青島坐下午五點鐘的火車回濟南，正是最冷的時候，車過大港，港已凍結，落日照在廣大的冰面上，冰面如三稜鏡似的，反映出五彩的顏色，頗呈宇宙奇觀。這冰面上的光影再放射到火車的玻璃窗上，又成另一種奇觀。車內水汀和暖，車外景物瑰麗，冬季旅行的趣味，迥無有過於此者。而火車在晚上行動，你睡在床上，到站，開行，往往不會知道，停車安穩，絕無衝擊情事，開車也不覺震動，大站停三分鐘，小站停一分鐘，所以剛剛停下，又開行了，這樣，時間都得不正確，還有一點，膠濟路上的大小車站，站房形式沒有一所相同，正和青島

的市房一樣。現在，青島和膠濟鐵路，又被日本人所佔領，引領遙望，不禁心嚮往之，什麼時候再坐在那精緻的小火車，看大港的冰景啊！

我的根據地是南京，在濟南一年多，也回去過兩次，半公半私先後逗留了兩三星期，我是十八年農曆春節離開南京的，上面已經提過，到同年農曆九月間回京，其間僅僅隔了五個月，南京的景象大變了，使我宛如從鄉下到了城市，光怪陸離，莫知所措，新馬路，百貨商店，電影院的增加，還不算稀奇，最令我感到奇異的是女人的旗袍，忽然變了樣子，就是變成跟現在差不多的樣子，穿在身上，人體的曲線完全暴露，裁縫店的尺碼單上加了「上腰」「中腰」「下擺」等字樣，這風氣自然從京滬路一帶起的，但在我們十八年春天最後一次去上海時，上海還是行着「直攏統式」的旗袍，這次忽然眼界一擴，就覺得半年不見的新都，繁盛多了，那時我還很年青，而且還沒有結婚，論我的思想，不能說不「前進」，可也居然看不慣，幸喜我的女友們還都穿着過時的服裝，保持着民十六革命時代的生活風俗，在學校中的女友，更是白衣黑裙，紗襪布鞋，蕙緞未改。電影廣告滿紙

「香艷肉感，粉腿如林」的字句，令人作嘔，所以在風景區或公共場所遇到一些得風氣之先的摩登女子，我就喊出「香艷肉感」的句子，這些人面孔也還嫩，往往面紅耳赤，疾趨而過，同伴罵我惡作劇淘氣，要是現在再拿這些話罵人，等於得罪了都市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同時也是一件更爲無聊的事，可是我總覺得九一八以後的種種災難，民十六國民政府執政以後未能澈底致力內政，改造風氣，這一點上，關係很大，所以後來再提倡新生活，也已經遲了。

自然，山東的旗袍，還須等待三五個月，才會從津浦路的兩頭輪送過去，那時濟南最時髦的是北平式的長旗袍，下擺蓋住腳面，走起路來，宛如演戲，這種式樣後來我到天津三年，始終流行，京滬一帶則又始終經行不通，其故何在，無人能知，如說氣候關係，平津夏季更熱，還是長旗袍，京滬冬季豈不一樣適宜，一種時髦，只是時髦而已，實在並無多大理由。

我第三次回京是在十九年春天，那是丘君已解除青島職務好久，說到丘君解職一點，

原因還是由於過去的大事問題繼續變化所致。上次我的調停，其生效於一時，結果終究非真他的政敵分開不可，丘君解職後，部下人物，一部份留在青島，比較親近的一部份由我分別介紹到濟南各機關，我到京，他又被派爲內蒙古黨務特派員，此項特派員共有三人，除他外，兩人是內蒙比較接近中央的「活佛」，我因鑒於他在青島之與人不易相處，對於他的內蒙特派員，並不發生希望，覺得不過那麼一回事，倘使真講使命，這樣年輕而於邊疆問題宗教哲學缺少研究修養的黨員，那又如何負得起這樣重大的使命？我敢說，社會也承認我和丘君的關係最深，感情最篤，我的短處他最明瞭，他的短處我也最明瞭，他是一個才氣縱橫，天真可愛的青年，他的思想滿肚子英雄主義，衝鋒陷陣，最爲適宜，掌握地方黨政大權，却妨礙了他的本身的發展，後來他在西京日報任內，因言論得罪地方軍閥，慘遭暗殺，固然是軍閥的無法無天，但由於職位與性格的不相稱，是一個原因，回濟後，中原戰局爆發，山東居河南之東，軍事政治，關係都大，黨報責任重大，工作驟忙，閒情逸致，一掃而光，而民國日報的工作也進入最堅苦與最後的階段了。

辛亥以後中國內戰史最大一役的「中原大戰」，到了十九年的夏歷端節前後，發展至最高潮。聯軍的勢力蒸蒸日上，西路雖還相持於豫魯邊境，北路閻軍則已從德州禹城直薄黃河邊上的濼口，濼口距濟南城很近，每到拂曉或黃昏，雙方的大砲便轟轟地響個不停，黃昏時分，報館裏的人，閉着無事，便在院子裏引領北望，抽手作壁上觀。不但報館中人如此，一般市民，對於這逼在眉睫的戰事，都作旁觀，並不恐慌，當時我很不解，後來才知道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濼口與濟南有黃河爲界，對方不易進攻，縱然渡河，濟南非軍略地帶，一過河便決定了勝負，地方不致糜爛，無所憂慮；第二濟南人對南北當局乃至對閻馮韓個人並無好惡。自然，有些腦筋新一點的，總覺得閻馮此舉，違背潮流，封建意識重一點的，又容易被「驅逐江浙勢力」「趕走南方人」的宣傳口號所激動，所以我的都城隍廟街的幾個隣居，也對我們民國日報的一些南方人仇視，乃至當閻軍入城時，亟亟乎引他們到報館裏來找我們，這是後話。

在濼口砲戰持續中，對方的便衣隊早從魯西混進濟南東門，對於省政府省黨部及中央

駐濟各機關的南方要人，調查得很清楚，住所那裏？行動如何？民團日報本着自己的使命，毫無畏怯，對河北勢力，攻擊之猛正如河北勢力攻擊濟南一樣，好些和我們親善的本地向業，暗暗地勸告我，以爲局勢如此，應該顧到善後問題，最好不爲己甚免得臨時無從緩頰，無奈我的個性素不妥協。我既反對北軍，筆尖再也無從變化，何況北平的新組織由我自辛亥革命就看不起的汪精衛主持，無論如何，談不上妥協。可是那時濟南的其他各報已噤若寒蟬，再不敢開口指斥對河了。軍事新聞，一本省府供給的消息，自己已不作主張。

到此，警察局的新聞檢查工作，反而無所事事。只有天生笨伯的我口誅筆討，來得起勁。對於我們汪主席兆銘先生，尤其不客氣。到了最後幾天，經理部幾位要員，大概風聲不佳，只是每天上午到幾分鐘，下午到幾分鐘，略微照料一下，就溜之大吉，晚上絕對不敢住在報館裏，我始終不注意這件事，一味「呆子不怕鬼」似的蠻幹着。

恰巧有一位也不怕鬼的朋友，滿天烽火中，從南京趕來，事先我替他開好了蘭埠的中西旅館。他到濟的第二天，正是端午節，編輯部同事王尊山君好幾天以前就約我在他的寓所吃

中飯，臨時我不好推却，十一點鐘陪這位南京來的朋友在館子裏吃了中飯，十二點鐘趕進城來，又到都城隍廟後面的一條小巷中陪魯山夫婦及其他幾位編輯部的同事過節，正在酒酣耳熱之際，忽然轟的一聲，震驚天地，房塌屋倒，山搖地動，如此巨響，聞所未聞，我湖六七個人一下倒在地上。接着有的爬入桌下，有的慘叫爺娘，我在一分鐘後，定神思索，這究竟是什麼聲音？炸彈嗎？無此宏亮，地雷嗎？無此規模，其他嗎？聞所未聞，總之，在我的智慧中，對於這件驚異的情事，已無法判斷，二三分鐘後，大家爬了起來，互相研究，還是得不到結論。我提議出門詢問，則門已關，窗上的玻璃也粉碎了。

出得門來，街巷中寂靜無聲，家家閉戶，人人息影，我到大街，才見站崗的武裝士兵，喝令我們站住，不准通過，等我說明了身份，聲稱回報館，才放行。到了報館已有人打過電話，詢問究竟，才知道是大明湖對面，北門城裏的火藥庫爆炸，爆炸原因據說係對方間諜所為，爆炸結果，玻璃窗的玻璃有半城震碎，大名湖邊若干屋子也震壞了，最驚異的是據當時在湖畔的茶客說，爆炸時因震動過大，湖水直立，宛如巨浪，致有若干游艇，

投入湖中，濟南風俗，端節逛湖的人比平時爲多，這些紅男綠女，酒後逛湖，正在放乎中流，逸興盡飛之際，忽然禍從天來，身葬魚腹，真不是他們吃午飯過節，魚肉雜陳，煙酒並進時所能逆料。

我因京友獨個子在商埠，定然驚慌失措，亟亟趕往，至則好夢初回，睡眼惺忪，全不知情，原來商埠距大明湖較遠震動不如城內之大，人在熟睡中，除近距離而尖銳的聲音容易受刺戟外，其他聲音往往不易驚醒，所以此友泰然。

自火柴庫爆炸後，前線軍事，一天緊似一天，後來對方因渡河困難，突然施用奇襲，由禹城分兵繞攻魯西，在東阿平陰長清分段渡河，這一來，濟南已在大包圍中，局勢頓然吃緊，不必要機關，紛紛撤退，民團日報因我之鎮靜，表面照常工作，實際上人心也緊，經理部的重要文件賬目皆移出密藏，負責人員的住處也不公佈，我因京友關係，每日下午到一次，晚上到一次，其餘時間都在商埠緯四路曾任統捐局長尤君私邸中。尤宅房屋很大，因防萬一，暫住此宅，尤君是本地人，很有社會地位，住在他那裏，至少本地所給予

的危險可以免除，而且房子大，有週旋餘地，縱然到了搜查的程度，也盡可一擋，我租東友住的是花園中的三間畫房，建築陳設，皆臻上乘，想不到在危難中享幾天清福。

我的住址，知道的人很少，除報館經理部中一位南方人和編輯部三位同事外，就只有包車夫一人，這車夫很忠實，少交遊，寡言笑，比較可靠，而且尤宅地處僻靜，進出也少，人看見。起初幾天吃飯由尤宅招待，後來因為飲食不便，我們就自己動手，買了一具汽油爐，一些碗筷，車夫兼採買，我們下廚房，一湯兩菜，六碗白米飯，每頓化一個鐘點，就弄得舒舒齊齊。此時學校放假，事情不多，上午在寓看書，吃中飯後去都城隍廟一轉，照料一番，到四點鐘回寓，準備晚飯，七點鐘再出門，做了社評，十點又回寓，時間支配得很寬裕，十點以後之事則託付王尊山君負責，工人們並不完全知道我的動靜，而且我房間裏的一切，絲毫不動，到後來終乎也吃了大虧，除行李衣服損失外，書籍文稿的損失，最為可惜，也是我一生損失文稿書籍之開端，到現在手無殘卷，囊無贖稿，形同白丁者，也是濟南開始的惡運。

這一天下午（可惜我記不清楚日子了）到報館，碰着外勤王志新君：

「西路前線開始潰退了，指揮部、省政府、省黨部、軍事特派員，統統在今天大清早向膠濟線撤退了，明天的報紙，再也沒有出版的可能的了，魯先生你個人的行址，今天也無論如何要決定。」

這是一個最後的警告，我雖然鎮靜也不能不接受這個警告，於是跟經理部中唯一留館招呼的一位小職員商量：

「請老兄轉告經理，我的稿子發到今天晚上為止，明天的報今夜須得印出，而且街道貼報和一般發行工作，須於明天七點以前做完。」

他答應可以照辦，於是召集編輯部的幾位同事開會：

「我們的報，恐怕只能出版至明天為止了，因為明天以內，敵人可以闖入濟南，今晚晚上我陪諸位到天亮，我們做一個最後的努力，明天以後，我們都將變爲濟南的囚人了。」

「我們來一次最後努力。」

那天晚上我特地叫了一桌豐富的酒席，在館中大宴賓客，個個吃得面紅耳赤，十分興。電報局送來的新聞電已經不多了，各通訊社的稿子也寥寥數頁，兩大張報如何安排，無量苦心，結果索性把各方「討逆」電報，用大字重排一番，於是這臨去秋波的「民國日報」成了「討逆報」了。我又做了一篇激昂慷慨，大義凜然的文告式的社論，算是在濟南二年多的工作尾聲。

稿稿很早，開印也很早，兩點鐘坐上那部雪亮的包車，走了，這是跟都城隍廟最後的一面。

街上靜靜地，警察依舊站着崗，也不會戒嚴，內戰，究竟是家常便飯，不算什麼一回事。第二天，一睡睡到十點鐘，大有無事一身輕之概。一個同事悄悄地跑來說：「關先生的軍隊已於今天一早開進濟南了，我們報紙幸虧在他們到來前貼出，算是抓住了。」對敵宣傳的機密，可是警察們正奉有命令紛紛在攔報，說是太反動了。我笑了一笑，反正誰失敗誰是反動的把戲從十四年來已經看够了，他又說老平「擴大會議」的汪主席精衛已貼出佈

告安民。汪精衛這可笑的人物，算是又佔了一次便宜。我的京友聽見汪先生貼告示頗爲動容，一定要親自出去看一看，我阻止他，他不聽，大胆的溜出去。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的時候，他對「改組派」原是有點迷信，那時我也是「改組派」的敵人，不過不是他們在朝的敵人罷了。「改組派」的嚶嚶們曾經多方阻止他，和我接近，終因私交太篤，破壞不了，想不到現在大逞威風，我將爲階下之囚了。

不多時我的朋友看了「汪主席」的告示回來，坐在沙發上一聲不響，情形十分神祕，我是怎樣的人，那有不知道他的心曲的，他陷入「現實主義」的錯覺中，這些錯覺，凡是舉現實的政治人，往往全有的，因此我也不予計較。

我們困在光公館，十分氣悶，津浦路固然中斷，膠濟路因兩軍在濰縣對峙，亦不通，真是插翼難飛，外面通緝的佈告已隨安民的佈告而來，同事們個個替我擔憂，那罪狀共有六條，主要的是「辱罵聯軍」「離開同志」「攻擊領袖」，（即汪精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再過一天，盛傳公安局已奉令將按戶查抄「京方餘孽」，這使我有些緊張，我知道外

「既然出了通緝的佈告，一旦緝獲，驗明正身，立抽處決，乃至梟首示衆，勢所必然，我爲工作而死，死無遺憾。我的同居的朋友因我受累，實在過意不去。終於我寫好了幾封情書，就了幾個電報，藏在密處告訴我的朋友：

「我已經被槍斃了，你就應用這些錦囊妙計。」
最困難的是父母愛我，我愛父母，既無媳婦，又無子孫，獨子親頭，魯家的香火，從此成了問題。……

人不一定吉。天却相我，救星來了。因外國人的交涉，膠濟路特開「國際列車」一班，時間就在明天。實得到票，可以走。實不到票，從此沉淪。於是我發願隱藏在市的幾個朋友，趕辦一切。
「國際列車」定在早上七點開行。我儘五點鐘就起身了，悄悄地洗臉，打好繡蓋，化了裝，我先跑往外邊。換我們的兩輛洋車和兩位朋友已等在門口。他們見我出來，就招呼車夫進內去搬行李。我呢？一個人慢慢地朝着車站的方向走去，戴著秋帽，穿著緞面的雙梁鞋。

香灰噴噴的夾袍，黑直貢呢馬褂，再架上一架黑腰鏡，這狀態，非有這狀態配合的舉止不真，所以我在晨間冷落的路上慢慢走，慢慢使動作歸於自然。有時偶而自己一檢點，覺得確有那種當時中年紳士或是商人的氣派，好在少年時代登慣了舞台，走幾步非本色的路，擺擺長袖管，確乎還像，新秋的晨風，吹在臉上，特別適意，我這濟南城中的閒人，也够飄逸。一年多的作客，想不到在這種神祕怪異閒適中別離，我究竟有些動情，我的朋友照我們昨夜的決議，當車夫和門外的朋友進去之後，就亟忙地繞到尤家正宅向尤太太辭行，尤太太還睡在床上，意想不到我們走得這樣快，也無從留起，要想出大門來，給我的朋友按住了。我的朋友又按照計劃，對尤家的門房廚子女傭付了大筆賞錢，他們在笑聲客氣中，忘了我們遷居的究竟，當我的朋友們離開尤家的時候，他們早已沒有看見我了。而且也居然不探究我之所在。

最後我默然的，是對不住那位跟我服務一年多的忠實車夫，我們不使他知道，自己走了，到七點鐘跑來服務，人去樓空，一定對我們有不好的印象，這幾張，報是不辦了。

我又不致外出，那輛白銅黑漆的包車就擱置在尤家，但我每天要他來做些小事，在第一天也按照計劃發足了一個月的工資，可是他決不會理解，發這一月工資，就是解雇的信號。

我到了車站，火車頭儀儀的響着，乘客的多，檢查的人也多，這些客車司機轉工的工作的效果竟沒多少，始終找不到他們的黑單中的大物，只好先替我買票的朋友巴巴錢買安子，三張票，見我來就叫我到待車室去，這是減少注意的方法。

月台門一響，我第一批上了車，接着我的朋友們背着行李也來了，伍子胥過昭關，幸喜頭髮沒有白。

車頭靜靜的，王丟丟眼色送行，我們就鎮靜地挨到蘇縣，因為是國際列車，南邊打過了關節，稍有開得出蘇縣自然通得進，車到韓復榘軍防地，韓軍上來檢查，毫不猶豫，是敷衍故事而已。韓軍可以說解除憂慮，要是閻先生的隨員發覺現狀，那也不成，為新聞記者，韓軍的軍隊，氣血上動，韓軍的軍隊，韓軍的軍隊，韓軍的軍隊，韓軍的軍隊。

談談問我們沒有吃早飯，到此餓腸飢腸，於是上飯廳吃飯，我的朋友帶着一方昨天吃剩的火星和朋友们贈送的點點紙煙過頭等事，碰着委員某附，連他同席，我竟懶懶不願坐在頭等下座邊，惹人注意，出他說罷，且甚開胃，令人注意，這會這理由，並好在此事已無關係了。從張的口

中知道省垣黨軍要入粵後撤退的催神，亦知知道軍駐上的密探，而關係在五南人以及

我們却都漏網，固然全仗化裝，可是聯軍的特務技術，也不高明。

日在青島住了五天，一搭着夜船回上海，并的阻文四鐵添行李也來了。五于青島期間，幸

與日聯軍撤退濟南後，由省黨部接致張長國其辭，打電到南京來備案，中央考慮之下，覺得

張長國之意見，恐有變故，必當負責，派人隨張長國，主要我讓步，而我雖然也以為各方辦事中央辦

無一不備，不必再由我去，但迫在情勢，將辭職，從衆手裏親自恢復過兩度，奉總量重權，於是

讓我自動要求，由中央調任政治學校服務，不想再做宣傳工作了。

天恩許照舊編發了一個月的工作，再是辦事不合照職，發給一月工資，將是報國的勤

勞又不算出，照辦白銀票的的公車，照辦薪水，再是許天恩辦事端小事，孫一

人神聖，商人李敏非人，因此張顯本亦不新，而新張于敏非人，小菜毫不經口。我
至非第三章一與希特拉同事。張顯本亦不新。

第一本，西歐版圖，每對張對張，我看了四頁資料，心裏非常想，因為我當時在
四行行九季版圖，一位師長又讓我要我到華北去從事新聞工作，我迫於輿論和人情不
得沒有辦法救活要救的稿子，溜邊路，我如如而辭介端。最後我讀的這圖書全味查味空。
第二工作地點在天津，報紙是十七年創刊，自出三大張，每星期加兩種畫刊，鎮海人業漸
方是獨功辦理的，天津商報也。因為原任總編輯辭職，在天津找不到適當的人，派人到
南方來物色，結果某先生介紹了我，又因為華北需要黨義的宣傳，附帶的工作，編輯以
外，做些三民主義的文字宣傳，這自然是不容辭的事，而且況民國日報下野以後的不快情
緒也早被教育的家麻痺透了。突然官商兩道，一。只是當時那時候，胡風森來。
報館在法租界二十四號路，對面，而兩層樓，像術莊統式的房子，很結實，只是空氣象
第一點，誰們是營業部，又組織的像銀行式樣，只我略略地看了一下，就進去相會經理王鏡林

看，王君的身材面貌以及動作很像希特拉，只是當時希特拉還未執政，大家想不起這個絕妙的綽號，現在想起來，真是越想越像，他蓄着希特拉式的小鬍子、頭髮，鼻子面龐一都像，就是他常喜歡擺的威風，突然行動的作風，都像。只是當初想不到，他見我來到，自然有一番客氣，接着領我參觀各部門，介紹各部門的工作人員：

地下的印刷房，規模不大，只有三架全張平版機，不過要在現在的重慶，那確是一等的大報館了。用活版排，並不打紙版，那時天津打紙版的人家也很少。切紙裝訂間的設備很完全，製版的技術尤其高明，技師是舊北京財政部印刷所的人員，當時天津有製版設備的就是高報一家，大公報用的銅鋅版也每晚叫商報代做，最有價值的是圖書室和資料室，別的不講，長國以來，國內出版的雜誌，差不多都齊，東方雜誌從創刊就到那時的最近不缺一本，西版地圖，也搜集得特別多，我看了圖書資料，心裏很喜歡，因為我這總編輯還兼主筆，每天寫一篇評論，假如參考書不多，那裏吃得消。

人物呢，南人多於北人，因此報館全吃米飯，可惜廚子是北方人，小菜多不適口。我

第二天從旅館中搬進報館，葉君把自己休息的一間房子讓我做臥室，那是全館最好的一間樓房，雙面而兼雙重的玻璃窗，地氈絨窗簾，全副傢具，四只電燈，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那是真太安逸了，隔壁是編輯部，指揮也很方便。

編輯部包括要聞，國際，本市，經濟，體育，戲劇副刊，電影副刊，賽馬副刊，普通副刊，及兩個畫報的編輯人的組織，但總編輯的職權只能指揮前面五種，五四時代和陳獨秀打官司，做過梅蘭芳秘書，北大學生張了知君的戲劇副刊，林琴南先生的第二位少爺林小琴君的普通副刊以及編輯人姓名記不清楚的賽馬電影等，皆不歸我管，或是由董事長指揮，或是由總經理指揮，各有所本。

商報的戲劇副刊，在民國十七年以後的國內報紙，要算獨一無二，或者說碩果僅存，五四以前，上海北京等埠的報紙，捧角之風本平常，自從五四時代陳獨秀一派在新青年等雜誌大肆攻擊舊戲後，文人們已不敢為舊戲張目，可是商報葉庸方君並不顧忌這些，或者身兼著舊戲獨據兩門，除飭鉅資創辦「永興梨園」，提倡業餘活動外，又以最大財力人力

是探探商報的「麒麟副刊」。

據說大聯隊薩芳祕書張了知君爲主編，每日發刊，並每日刊載伶人稿件，照四四方之譜，我親見伶人銅版在五千元塊以上，當時價值就在萬元，如果在今天，非幾百萬元不辦。因爲五分錢的銅版今日已非三十元不可，自然商報如在今日的後方，也不會再有此豪華舉了。

據說葉君除票房，副刊外，爲探角所耗資財不下三十萬，至今梅蘭芳還欠他一筆巨額的債務，三十萬在今日自然又不算一回事，但幣值高出百倍的當年，至少是伴駭人聽聞的事，又據人說，葉君爲了捧角成名，常不惜鉅資爲某一個角色包通一月，贈券四飛，親朋勳員，華燈初上，看白戲者已高據包廂，但有時座位太空，葉君則連電報館，請編輯都早發稿子，光臨戲院捧場，這樣的豪舉，真是空前，而商報正面的價值，也爲了這過份的動向，跌再跌，商報在民十七年出版時，僅採訪工作方面自備採訪汽車三輛，採訪十六人，中國新聞界從無此等規模，終於因爲不走正路，以致再衰三竭，在我任總編輯

時代正是再衰的時候。葉老板包廂捧角的能力也沒有了。這好景不常，確很難再見艱苦的時候。滋味落在我的身上。

「查刊呢？也是利用自己的製版部。利用五千多份人銅版，再加上一部份摩登女子，時

事風景及小說雜文，每週出版兩種，確也容易。」

體育版由天津籃球界五虎將之一的李世琦君編輯。材料豐富與席報的體育欄足夠拮据。抗戰。

「經濟版專種商情，理論不多，基本定戶就靠這商情維持。林小琴的普通副刊，以舊文的學爲主體，也能吸收一部份讀者。最奇怪的是賽馬專刊。天津賽馬場每年春秋兩次，而每次延長至兩星期。賽馬期間，報紙銷路大增。馬會內外，人手一張。洛陽紙貴的原因，是除掉刊載消息結果而外，還接天刊載每匹馬的預測。雖非每馬猜中，却也有六七分的把握。因此一般賽馬迷者，都以商報的預測爲藍本。」

姓王的既走，本市新聞却找不到適當的人編。結果由朱勤謝友蘭君兼辦。謝君曰天龍。

第三章 與希特拉同事

新聞，晚上發稿子，着實够忙，幸喜他是個跑得快寫得快的人，一萬字的本市新聞，拚拚抖抖，每天也居然不差，當時的天津新聞界，非常注意採訪，各報競爭很利害，大家都以「本報訊」之多寡好壞為競爭條件，不像上海記者的「分工合作」，大家便宜，也不像今天重慶新聞界的多半揀仗「中央社」，可以高臥，外勤中多半是年青記者，好勝心極強，當時如大公報張慎子，益世報的李 都很有勁，謝友蘭天生一副緊張面孔，寫字跟說話一樣的快，聯珠幾砲，一稿完成，故當時有天津三鼎甲之稱。但是張李兩人並不偉助的苦，晚上還要發一萬字的本市。

這裏也可知道，商報編輯之少，三個人編了四版，我還要兼裏社評，論總數却也有八個人，只是副刊太多，分配不過來，外勤呢，此時已剩了三位，跟十七年浩浩蕩蕩的十六大枚時，真真天淵之別。

各版材料，除各個副刊各有其特殊的來源外，國際譯自當地的各外國通訊社，王鍾冰君精通英文，他親筆譯的比較多，此外經常有兩個翻譯辦理，國內係用六只收音機接收各

方的新聞電，南京的中央電也在其內，不過並沒有正式向中央社訂購。商報的電務室關係很大，報多而化錢少，可謂取巧，但如果經理部對該室同人的薪工，久久不發時，電報也就少了。

北平的稿子，每日坐下午五時的快車東來，派人在東車站守候，每夜十點前就可遞到。我到天津正是冬天，那時候稿人每夜在車站回來，看他真冷，一到編輯部就把雙手靠在大火爐邊，那火爐也真熱，到十一點後，大家都脫得只裹一件小夾襖，這自然是煤便宜爐子大的緣故。我可以說不很怕冷，除穿南方人的冬季西裝外，房間裏不生爐子，實在隔壁編輯部的熱氣，够我受用，而且雙道玻璃窗，再加幔子，外面的冷空氣也很難進來。

到農曆年節，天津襲着北京的風俗，送禮請酒很忙，尤其是租界上住着不少民國以來下野的軍閥官僚，官雖下野，架子仍足，大廳門裏面夜夜鬧着猜拳鬥牌，外面有比任何租界馴良的巡捕們保護着，決無上海的綁票之險，一般平民們也是吃吃，穿穿，婦女裝幀上戴着紅花，小孩子穿着紅衣，南方人一樣的糯米年糕，糟雞醬鴨，天津本地出的是大

等。頭等的由三北太古招商的輪船，一趨趨地從上海載來，綠興的黃酒，雷波的海味，杭州的麻蘇糖，蘇州稻香村，札足靴足。我呢，最愛吃寸金糖，麻片糖，甘炒瓜子，椒鹽花生米，類的土貨，於是也裝足了四大罐。那些非巧克力太妃糖不上眼的摩登記者，自然當我土老二看。但人各有慾，對症服藥，最配胃口。講到年節裏的水果，不用說，梨是第一。可是青蘿蔔，據說解煤毒吃的大也着實多，最容易逗人胃口的，不能不說是良鄉栗子，披着一層紅綢的電燈招牌，不但能夠炫耀了，再加上那種鐵與鐵之間夾着砒的沉重而急躁的樂音，再加上那股甜香，不能不叫你停住腳包兩角，就是在編輯部裏，在糊炒栗子的季節裏，如同南京吃花生米似的，最是一件尋常的事。每晚編輯部工作到一半的時候，一包一包地送進門來了，於是各個書桌上散着半邊半邊的栗子殼，這種栗子本來是不整齊，這樣更凌亂了。

編輯部中實在浪漫，也實在舒服，高談闊論，誰說嬉笑人無所不有，我並沒有想到應該如何整飭一番，如同機關中長官對付部屬一樣，實在風氣如此，也不容你整飭，不過這

並不會妨礙正當的工作，因為在緊張的時間中，決不會無故鬆下來笑鬧，大都在「等稿」或「完稿」以後。

午夜飯，在濟南民國日報時，大家都吃稀飯，天津，究竟是都市，記者們比濟南奢侈多了，上班以後，誰就打個電話，送幾送饅頭餃子，乃至整客的西菜，照樣有穿着白衣服的人恭恭敬敬地送到門前，價錢呢，每客八毛，一塊，這樣的一安逸「生活」，現在重慶的記者們除非像我此刻的畫餅充飢。

春天裏，住在天津最悶，實在沒有地方去玩，俄國花園因為租界收回的緣故，已經敗壞不堪了，英國花園和法國花園規模是那麽小，除掉母親們帶着小孩子每天散步外，像我們這海闊天空的人，如何能滿足？然而天津的摩登女子，不能不照樣時令，穿着高領口的單旗袍。飄飄然地橫過馬路，春風過去，旗袍邊吹得高高地，露出粉腿來，對面的行人注視一下，她從滿塗法國胭脂的臉上，掛起笑容，春在天津如是而已矣。

但在「春和」，有北平來的名角。在「天祥」，白雲鳳唱着「柳綠玉葬花」。

小高爾夫球場開放了，彈子房也擠滿了洋行小鬼，十一點黃牌綠牌的電車，還在鋼軌上逡往迎來。

夏天，正是國民飯店的露天跳舞熱鬧的時候，我忽然病了，那場病，自我從十七年以來最大的一場病，最初有點感冒，假如吃兩片「阿司匹靈」，睡一身汗，也未始會不好的，年青人大意，正在發寒的時候，市黨部的魯蕩平邵華來帖子請，王鏗邵老兄一定拖我同行，恰巧請的又是露天花園，風一吹，火上加油，不終席而退。第二天病倒了，館裏面請了位說是很著名的西醫，一連三四天，有增無減，有人建議改服中藥，編輯部裏一位寧波人，三脚毛，承他好意，自告奮勇，給我按脈開方，斷是傷寒，結果病勢愈來愈凶，熱度高得可怕，後來又換醫生，斷為瘋病，天天吃苦藥，天天無希望，我平常因為少生病，不注意醫藥，缺乏這方面的常識，所以亂投藥餌，病到頂點的時候，已粒米不進，六月天氣，門窗關得緊緊地，然而外面一聲響，心旌搖搖欲墮，靈魂就飛上半空，偏偏地下層開印劉雲碧的「紅杏出牆記」，整天的開，印了兩星期還沒有完，晚上印報，白天印書，三架犬機

器，整夜轟隆隆地響，簡直如進地獄。此外，隔室編輯部的電話，又整天整夜地響，令人煩極，恨不得把電線割斷。還有那製版部的電線聲，尖銳得刺耳。有時此起彼落，有時兼聲並舉，真要我的命。好多朋友勸我快進醫院，我素無此習慣，認為在醫院裏連朋友也看不見，種種制度又和我的習慣不合，所以始終不進去。

在館裏，每天有人來看我，尤其副總編輯江翔城君，總是耐心的爲我操勞，我吃的藥，米湯，稀飯，也由江太太親自動手，我很感激他們，因之認爲醫院中的所謂護士，決無如是之疑。

最後有一位南方人介紹我一個內科醫生，說是十分靈驗，推不出診，因爲這醫生身體很不健康，年紀也大了，而且每天只限看十號，於是我穿了夾衣，坐着汽車到英租界，汽車過去，只見街上滿是袒胸裸體搖着芭蕉葉子的人，最初很奇怪，後來才明白是在酷暑中。

到了大夫家裏，掛了特號，醫生顯損病鬼似的，把了脈，想了半天，看舌頭，又把脈，又想了半天，然後堅決地說：

我倆正在吃稀飯，擲筆的長途電報來了。謝友蘭兄一手捧着稀飯碗，另一手提起聽筒，在幾聲怪異的詢問之下，忽然啊啾一聲不領碗跌在地，再又我們大家都不覺驚異，不知道發生甚麼大事？想問他，他連搖說破飯碗的手，隨着拖過紙筆，刺刺地嚷道：「唔，這一面飛快地寫下來，等到謝友蘭頭專機，即便很沉重地，把紙條擱在電話機上，我又會到那面，這半，這糟噠！糟噠！這舉人突然攻打北大營，已經進了瀋陽城！」

這消息如同不及掩耳的迅雷，我們都愕然了。兩肝，每天一萬字，自當與對面談話，出，林三狗，電話又響了，友蘭放下筆，又去接「什麼？什麼？瀋陽已經丟了！是接誰的電報？……」

參謀長從檢閱來的電報，那怎麼張長喜呢？誰是我不到？早睡到這地步，

（譯出）九二八，這一種以後，也正如炸彈落在海軍，又掀起漫天的怒潮，不漫天的水花，不空中，飄從萬寶山，以乘早埋伏着憤怒，如地雷爆發了，天津雖然氣比北京，那有那麼多的學生，

你比上海有那麼多的政治份子，不然而既壓大都市，也最易表現愛國熱情，記得我九二五

既發表了「論痛斥不抵抗主義」痛痛責我，這位真明其妙的青年，「長官」的社証後，九二星

期之中，收到同意的信件達百餘封。人數在五百人以上，學生，店員，公務員，工人，軍官，黨員……都有，這實是不可忽視的民意。我知道中國人心未死，儘管強敵壓境，又儘管有這些不敵不收，高揚「不抵抗主義」的地方官吏，政府終究會和日寇交戰的，於是，我擺出國民外交的姿態，天天主張對日抗戰，又天天痛斥張漢卿等的不抵抗，兩報本來不重視政治，此時的政治言論，因為比天津任何一報激烈，結果銷路大增，早晨報還沒有貼出，站在報牌下等報的已經不少了。

我除每天寫社評一篇外，又增編一層「抗日」副刊，每天一萬字，自寫與投稿者各半，也因為有了這個副刊，籍着文字，認識了不少慷慨悲歌之士，可是終于最大的壓力來臨了。因為刊了一首廣西天學校長 屠君武先生讚頌張漢卿的七絕詩，涉及當時北甯路局長袁大如的私事，在順承王府內告了床頭狀，密令報警。於是除掉英法兩租界外，所有的報章，都往天津，天津報章，日租界自己早已不敢去賣，河北及各特別區看不見報了，各省的報在郵局扣留。天津北甯鐵路在車站扣留，損失不少，幸喜館方識大體，尚耐得住這個痛。

社論必須代表「民意」，「主張」必須出乎「良心」。如果不能代表民意的輿論，還是沒有的好，並不出乎良心的主張，也最好是少拿出來。

一個報人到了不能說話的時候，自然心灰意懶，什麼也不想做了，所以我不但每天的社評短評一律停寫，「抗日救國」附刊撤消，連國際版的稿子也不願再發，反正那些國際聯盟的把戲，帝國主義外交的鬼話，也看厭聽厭，再看下去，眼睛裏會冒出火來。替他季順報告的文章好，西門爵士的口發給也，我一律以帝國主義符咒視之。於是把全部編輯部的職務交給副總編輯江劫城君，我自己逍遙報外。自然，起初是向館方堅決辭職的，無奈館方一定不答應，館方也知道我受了思想上的刺戟，要我多休息一個時候，可是我態度一變，除每天到深夜回館睡覺外，其餘的時間多半在外面散心，上午是遠處的寧園和幾個近處的小公園，下午是天祥彈子房，或者是聽劉寶全慷慨激昂之京音，或者是聽白雲鵬婉婉宛轉之八角。晚上呢，酒綠燈紅，沉醉的範圍更廣，不是名角，就是名片，除梅荷荀程馮而外，還有一個唱花衫的坤角毛劍佩，是從前上海九畝地新舞台花衫毛韻珂的女兒，每戲

必看，原因是毛伶之「媚」太舉世無雙。對異性美的愛好，乃人之常情，我何必諱言，何況那時我正是青年，又在惡劣的環境中，倒不是「醇酒婦人」的意思，而是使閉情有所寄托，故更火熱的情緒得以昇華。毛伶的風韻實在能使我心平氣和，字跡未滅。可是我除掉接受她一張至今還珍藏着的像片而外，絕對不作其他的企圖。我知道進行非份的企圖，不但會使你煩悶，而且華美的環境，也會幻滅。所以我和她的見面，始終在紅毛氈上。實實在在的美，在我有知識到認識她為止，在認識她到此刻追記她為止。至少，我個人所見過的「初中國的女性」是沒有一個能趕過她的。至於他內心的美如何，我沒有正試和她做朋友，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最高的美就在「媚」上。一條條輪廓五官色澤韻，舉止行動韻。一舉一笑自然韻。一啼一哭也韻。當你感受她韻的美時，沒有你自己，沒有世界，也可以說沒有了她。而且是在舞廳中，在鬧鬧嘈嘈這一個韻的美中。可是她是個靠帶的女性，又因職業的關係，容易發生人聲鼎沸後來聽說因為和一位進場的「浪子」鬧婚姻問題，自殺了。世界上最美的本質的

毀滅，往往是非常的，幸喜我對她沒有用情，對於她的死，只是如一幅名畫之被焚，珍玩之被毀，可惜而已。否則，我將悲哀至不能自救。

天津玩膩了，自然轉移陣地到北平。北平的好處，不用我多說，多說也不是這篇稿所能容納。總之，我那時實在是個閒人，手裏提着照相機，衣袋裏裝着錢，到處玩，到處化，「魯三爺」之稱號也和我們同業中的「X三爺」一樣出了名。

天津這地方，不過是華北貨物的吞吐口，談不上文化，雖然有幾個學校，像北洋，南開，商學院，女師等，但也影響不了社會的風氣，只看見買辦階級的耀武揚威，只看見大腹賈的氣焰，只看見土貨原料的流泄，只看見花花綠綠的外國機製品的侵入，全天津被銅臭籠罩着，隨地都是商品，什麼都商品化，人與人之間除了錢的關係外，其他是很少。他比上海的面積小，比上海却醜惡得多，因為上海雖然一樣是買辦階級大腹賈流氓支配的世界，但還有許多出版物，許多文人，可以使你喘一口氣，而天津幾乎很少有出版物，文化人，好些學生，是頭昂着天，嘴唇上翻，滿口「嗎事」「嗎事」地流氓俚腔。出版物呢，像

我們商報所出的畫報，「戲子」多于「明星」，「明星」多于「仕女」，仕女多於「山水花卉古蹟珍玩」，畫報幾乎全都是戲子的宣傳品。有什麼可觀？小報是橫行着，上海的小報，兩角錢看十二份，火車生意而已。天津的小報像劉聲公辦的「新天津報」每天出四小張，除滿紙黃色新聞外，七劍十三俠式荒唐小說，每天同時有六七篇刊出，下流社會歡迎之至，我常常看見在深夜裏，郵差電差經過馬路旁的報牌時，提起馬燈，也要看他半點鐘，所以「新天津報」的銷路，實在在那時候「大公」「益世」幾家大報的總和之上，因此「小人書」即連環畫在天津的勢力也很大，任何一個弄堂口，總有租閱小人書攤，一個「大子」可以翻半天。小人書也不一定都是兒童閱讀，反正略識之無的平民多半喜歡看這些有畫有字的荒唐故事，此風在上海也盛，人們要求知，只怪當局不注意，致人民受不到正當的教育。

小報中有一份叫做「天風報」的，每日四開一小張，一面排隔日新聞，全是頭一天在各報剪下來，第三版副刊，是天風的主要版面，除捧角外，完全刊登討論「性術」和描寫「性藝」的文章，其黃色程度，比抗戰前後的上海「社會日報」深而且濃，其餘作有談

總足有益於男性者，有談山西大同的婦女如何如何者，讀之令人驚異。可是沒有人出而取編，租界中的墮落，任何都有，文字墮落，也是一端。還有劉雲若等的長篇小說，像「紅杏出牆記」。「小揚州誌」。「春風回夢錄」等鴛鴦蝴蝶派的文藝創作，也比京派新文藝流行得多，北平跟天津路那麼近，每天有幾班火車來往，但是北平的文化，始終走不到天津，真是怪事。天津的半方名士是吳秋塵一流人，後來來了徐枕蓀，侯曜，也確實被人捧過，可是大公報的張季鸞，益世報的羅隆基，在天津，「文章報國」的文人，并不吃得開，也不像現在的重慶在報上寫寫社評，雜誌上發表些專論的「文化人」，紅得發紫。

那時候在天津做報的好友，言論是自由一些，所以天津的幾份大報也比較有權威，就是現在大公報的地位，也還不是在那時的自由言論下培養成長的。可是我爲了一塘活協定後的無話可說的關係而擱筆休息，而放浪形骸，久了，不但覺得太膩，而且自己覺得究竟太無聊。於是堅決離開這全市銅臭的「天津衛」，回南了。

回到南方，一樣的在塘沽協定以後，而且早已通了郵，天下是暫時太平下來，少數違
慮的或者在打算百年大計；（在那時的認識和估量下只能用「或者」兩字）多數淺見的，
却十分粉飾太平，享受眼前的洪福，尤其是「汪精衛之流」厚着臉在「共赴國難」的口號
下，入京撻腰，好些人更有所躲避。丟了說話工具的事，也決不想在狹窄的嘴上說一句話
惹人不快，只得向其赴國難的朋友們拉拉手，肩起鋪蓋，一直回浙東老家。

在家鄉，魚蟹蝦蟹樣樣鮮，白菜豆腐樣樣美，再加上青山綠水，真是回到了自己的
家，不想再服務了，只要日本人不動手。人家儘讓人家去京華寇蓋，自己却只想暫時能做
個義皇上人。

第四章 阿Q的精神

汪先生因爲中央黨部的一擊，又抱頭而竄了；同時汪先生連日本的傳說，也各處傳播着。這結果發生兩種現象：一種是不抵抗主義者和親日派大爲驚心；一種是抗日份子吐了一口氣。固然，那位在中央黨部院子裏拔出手槍，對正這位妖嬈得令人魂銷的端坐中央，正待拍照的常務委員射擊的真正動機，世界上除掉這位冒充記者及其主使人物外，誰也不知道，但是人人欲得而甘心的人物，有人出面殺他，實在最容易引起同情的。可惜當時破一位老革命黨救了汪先生的性命，否則現在的南京僞中央，決不會具有國民黨副總裁資格的人，去坐龍庭的。可是汪先生經這一嚇，賊膽心虛，又溜到他那一革命的本營，上海去了。不久又以治病藉口，再溜到歐洲去了。這了只留下一堆空口說白話，南京既走了妥協派的巨頭，空氣自然澄清不少，而負責當局對於復仇毒辣的準備工

作，暗地裏也異常起勁。住在稽山鏡水間的我，究竟年紀還不大，不適宜老做義皇上人，又經朋友的德惠，師長的督促，於是一肩行李，再到都門。做些有關教育文化的工作，事情是很清閒，每天只做半天事，半天不是看書寫文章，便是到陵園看花，到後湖划船，好多公務員中的朋友們，十分豔羨。二十五年的夏天，南京新聞界繼「三民導報」、「民生報」而後又發生一件大事，衛戍司令部發覺「大華晚報」的主持人殷再為有通日嫌疑，除拘捕他本人外，把報館也封了。殷再為在新聞界有相當歷史，平時交遊也廣，南京的新聞界除龔德柏和他合不來外，其餘都有往還，我和他遠在民國十六年杭州國民日報時代相熟，所以我到京後，每星期總有一二次見面的機會，他的年紀不大，可是很世故，我常常爲了政治上的種種缺點發牢騷，他老是勸我，尤其是捧着水煙袋慢慢地說話，活像個老年人。有時我也很感動，覺得我還是這樣躁急，缺乏涵養，應該拿他做榜樣，少罵人，多修養，因此我對他着實佩服，却想不到他有通日嫌疑。別的官司，還可因為感情關係，由頭奔走，通敵嫌疑，如何能幫他的忙。若是果真通敵，也就是我個人的顛，因為我的「反日」

不能算不堅決，也因為反日關係犧牲了天津商報的工作，和若干親日份子磨擦衝突。可惜那時候的日本，無人敢呼之曰「敵」。殷再為罪狀，在報上所能見到的也只有「某種嫌疑」四字，若公開用「通敵」，或減輕為「通日」，我們真是痛快極了，也可見當時環境之惡，國人言論之不自由。

大華晚報是殷再為的第二個新聞事業，他第一個新聞事業是「日日通訊社」，總社設上海，分社設杭州，南京等地，在日日社發達時，大華簡直是點綴品，每日出版半張，銷路僅八百多份，二十四年春天經我幾次建議應該整頓，這張晚報，因為南京其他的晚報，如「人民」「南京」等一樣的不能令人滿意，假如大華能革新，一定能滿足首都民衆的嚮望，却巧他那日日社的業務，日漸縮小，他也有全力改進大華的意向，於是擴充篇幅至一大張，極力充實新聞和提早出版。請一個姓汪的文人編副刊，我又替他寫一篇「龍爭虎鬥」的長篇小說，因此到二十四年底已經由八百份提高到三千份，可說是限南京晚報的新紀錄。同時他又在國府路開了一家中山印刷所，有新式對開機六架圓盤八個，那牌子是新張

界和機關中的朋友湊成的，來路也還沒有什麼不明。

中山印刷所成立後，對於大華晚報的幫助很大。過去托人代印，正像文化新聞似的，痛苦萬分，出錢既多，指揮又不靈，大華既由中山印刷，無異自辦印刷廠，一切自然便當了，我也因為對大華的業務，多所參贊的關係，印刷所及經理編輯兩部職員，多半熟識，那天忽然封了門，這些職員，紛紛來向我訴苦，但是案情重大，我有什麼方法幫助？却巧許多愛看大華的朋友慫恿，要我趁此時機，出面辦一晚報，以頂替大華的銷路，我想此事甚佳，一面使大華的一部份職員不致失業，一面對首都市民仍有如大華一樣的晚報可觀，而且對股再為經營大華在業務上的苦功，也有所延續。於是發起辦「大夏晚報」，仍由中山印刷，除編輯部僅錄用大華的兩名校對外，其餘廣告發行及至信差報差一律錄用，因為當局既祇拘捕股一人，對普通職員並不追究，我又何必忍令他們失業呢？

不過我辦大夏的動機，除對首都市民文化服務及維持大華職員的生活外，還存着報紙上各種技巧的試驗的性質。因為「山東民國日報」一切未便標奇立異，「天津商報」的

主權不在我，事事仰人鼻息，想做我的試驗品不容易，「太夏晚報」，由我發起，雖然也有朋友的股份在裏面，這無異是對我的經濟上的援助，所以我很自由，但到了報紙成功的時候，却也因為我當初的大意，隨便邀人合作，弄得很痛苦，這是後話，現在先敘述創辦的經過？

在中宣部新聞事業處的辦公室裏，第一次把我的計劃給李良侗、孫東城、江翊城幾位朋友聽，他們非常贊成，希望我來無形中接辦大華，並願作股東，這時候廣東中山日報的李伯鳴和剛由首都新聞檢查所下台的林森曾也在座，李孫兩人拉他們入夥，他們也答應，尤其是林森曾因為游手好閑自願替報館負一部份實際責任，我自然歡迎。因為伯鳴遠在嶺南，東城和良侗身處主管地位，不便參加實際工作，我個人當然忙不過來的，這算是最初的發起，我離開了新聞處，因事到總務處，順便又和葉敬持兄一談，他信任我能辦報，志願入股，離開宣傳部，又和組織部的陳劬同志一談，他也加入了。我嫌股子少，再跑到黨史會和陸舒農、高良佐兩兄一談，他們更是贊成，因為他們平日也愛看大華晚報的，自從大華停後，

讀到每晚黨報可看，異常熱鬧，聽說我清出面辦大夏，他們非常贊成。除願出錢作股東並經常寫文章，同時介紹陶林英同志加入。如此連我已十二個了，此十人雖說都是中央黨部的職員，但我們純粹是私人的結合，而由我出面，並不與黨部職員不准辦報的命令相抵觸。

半天功夫發起了大夏，三天在我家舉行正式發起會，審查各項計劃，決定出版日期。到了家裏，猛然想起同居有一位報學專家劉覺民兄，何不跟他作一個最後的商榷，他是美國密索里大學「報業管理」的唯一留學生，正和學編輯法的馬星野兄在中政校新開系教書，他聽到我的報告和計劃後，又是極力贊成。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再有人反對，也無從破壞了。於是連夜和覺民擬就種種章程計劃。第二天對中山接洽了印刷，到大華和廣發發行各部職員發了口頭聘書。珂珂有一個過去中學時代的同學叫做郭稼祺的，從江北軍陳營軍需帶下來，因為郭大很幹練，就請他當事務員，立刻要他找房子。

到了第三天，編輯計劃，廣告計劃，發行計劃等等以及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規程，報社

細則統統印就住房子也找到了。一開會，順利成立。大家推我爲常務委員，劉慶昆兄爲副。劉主任高良佐兄爲評論部主任，葉敬持兄爲審核部主任，推林森君爲經理，推商報時代的老幫手江翊城君爲總編輯。報社的最高權力爲報務委員會，日常負責人爲常務委員。並決定一星期爲籌備時間。五月十四日至五月十五日出報創刊號。由我當了四版。臨大鑄印機，幸爲大夏晚報。在南京大行宮旁邊的碑亭巷口，交通雖比不上新街口的中央，朝報，新民，扶輪。可是比中國日報，南京日報，人民晚報等却好得多了。這只是房子太小。臨街的樓間營業部，其後面臺子間會計室，二樓是編輯部。其後面會客室。但也勉強够用。最初的設備更簡陋。除雷燈電話桌椅而外。什麼也趕不及。用白紙寫上「大夏晚報」四個字。貼在門。門就開張了。

當時我親手做的廣告是「准令區至五時正出版」。所以從上午時起。六屋柔的忙忙得什麼似的文章。沒有截版。新刻的版式不熟。第二我們都沒有辦過晚報。對於晚報的時期。經濟法缺乏經驗。可第三好些股東朋友。沒熱鬧。北手八脚，反而妨礙各部分負責人的工作。效

涉，幸喜報販一見我手中的報紙，部份轉變方向，趕到國府路印刷所去搶報。五點鐘全部出齊，全市除零批外，分十一段整批整發。不一會，滿街滿巷浮起一片叫聲，在沒有辦過晚報的人，聽見各處喊着自己所取的報名，確有一種異樣的趣味。

不過這種一如以唱戲爲過癮的票友生涯，究竟不是合理的報業行爲，所以三兩天後，報社就紛亂得不堪。主要原因，擔任經理的同志，雖然在新聞檢查所做過事，認識一些報界的朋友，看過不少時間的稿子，對於報業實際工作，究竟缺乏經驗，他越起勁，事情越糟，大家都以爲他是個股東而又兼經理，礙於情面，無可奈何。我以報委會常委之職，實際指揮，他居報館法人地位，而無自知之明，結果政出多門，一般辦事大感困難，影響報紙工作，無待細說。自然，我們在立法上有大錯誤，所以會出此弊竇，發起人缺乏主持的，我不能不負責任。可是當時大家都無所爲，林森會君新自首都新檢所下野，沒有滑溜的地方，所以讓他來担任法人名義，對政府機關辦手續，對外代表代表，我則孜孜實際的業務，不過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但憑理想與熱情，到後來往往會出岔子，當年的「大

「夏晚報」，就犯此病！

自然，窮則變，變則通，股東們明知這樣僵下去，報館馬上會關門，於是又開會討論，結果經理之上加設總經理，由我兼任，另聘中山印刷所經理曹志遠君為經理，希望他在印刷上多幫一點忙。這可以說是一種報館內部的人事調整，但從此報館的壽命固然延長了一些，而報委會內部的裂痕也就潛伏着了。

變更登記以後，對內對外都由我一人負責，我只好打起精神，夜以繼日的工作。我和報委會設計部主任劉覺民君同居在玄武門裏的畫家巷，他因政治學校新聞系的教課忙碌關係，也少顧問大夏的事，而且從來不曾去過報館一次，可是他看我這樣起勁，也有些不好意思，於是答應每天在外國畫報中挑選諧畫一幅，製版刊在小副刊上，他日撰打油詩一首以配合諧畫，這工作總在每天早晨六七點鐘我們「書房會報」的時間中辦理，因為一吃早飯，他便要到紅紙廊政校上課去了。我在他選諧畫做打油詩的時候，開首便寫我大副刊上的長篇小說「王大可別傳」。王大可是我替「大華晚報」寫的長篇小說「龍爭虎鬥」的主

角，首都人士對「龍爭虎鬥」頗感興趣，而龍爭虎鬥主角王大可的思想言行又是那時新官僚的寫照，大家認為非常現實，所以特撰「王大可別傳」替大夏做廣告，小說寫好，他的詩畫也成功了，於是到餐室吃早飯，飯後，他走了，我便整理頭一天在各處拉來的副刊稿件，並撰小評，九點鐘我出發到碑亭巷，把我所經手的兩個副刊的稿件分別賣給了辦副刊的編輯人後，我就開始看報，先是南京各報，後是外埠各報，足足看到十點半，本埠社會新聞和外埠通訊的編就稿正待核了，十一點到下午兩點可以說是高潮階段，有時連客也不見，兩點以後，除跳一次印刷所外，便看第二天的副刊稿件，或是約定客人。那時寫專欄的卜少夫君，寫掌故的劉公畏老先生，都來清談了，編輯部裏與剛才的空氣，真是大不相同。

五點鐘看了報，便挾着皮包到外面去拉廣告。那時候的廣告，非常便宜而且各報爭奪得利害，跟現在重慶要預先登記，月月漲價，正是個反比例。門市既少，由廣告社，廣告員來的又須經過折扣，爲了鼓勵同人，任何人攬的生意都有好處，報館的收入大受影響。

於是總經理親自出馬，既無折扣，又係現付，每天出去，只少第二天的紙錢，有了把握。最初也有些難為情，以後竟也慣了，可以說成了一個業餘的廣告商。當時廣告的便宜，現在聽起來，無人相信，封而整版，只賣國幣二十元，那些「國民」「新都」的電影廣告，銅版鉛版，花花綠綠，費了半天排工，也是二十元，現在看來，不夠一個手民販幾枝煙。

跑廣告回來，各部門正結賬完畢，分別看了賬，才算完事，可是要錢的人也在這時候磨集了，第一種借薪水的，第二種借稿費的，第三種討紙賬飯賬的，跟小報館發生關係的比大報館的彷彿窮些，現在想起來，假如還是五塊十塊的應酬，這些窮文人實在早已死光，也無人替報屁股寫文章了。

七點左右，出門吃應酬飯，過了飯局，照例到新街口「留香園」喫茶，那是爲了應酬一些新聞界的青年朋友，像陳振綱高龍生施白蕪諸君，他們每天要到留香園坐坐，留香園無形成了首都青年記者的俱樂部，包括外勤，本市新聞，副刊編輯，特約記者，插畫家

等，他們起碼十多個，其實連茶帶點一次的招待費不過五六元，那時清茶一角一杯，冰菓淋汽水兩角，各色麵點也不出兩三角。大夏晚報經濟困難，利用私人友誼，應酬功夫，每天不出稿費，得些好稿子，站在報館立場，確是個經濟政策。

沒有飯局，甯可回家吃冷菜，也要先在留香園逗留些時候，實在坐慣了茶館，怪有趣味，何況跟新聞界的青年朋友在一起，話題那麼多，話匣子打開，大家就收不了場。有時更深夜靜，幾個人還高踞留香園樓頭，嫵媚清談，遠處霓虹光的彩色，簷下大華散戲後的倩影，跟冷飯香茗一樣的足以恢復一天的疲勞。臨了，坐着車子洩洩然從中山路由鼓樓入中央路到玄武門，一路幽輝照眼，清風拂面，石頭城的夏夜，真不可與現在的巴淪同日語！

到了家，除女傭外，一家都早入睡鄉，自己從餐室的冰箱裏取出冷飯冷菜，慢慢的吃，真是別有風味。有綠豆稀飯時，加上荷蘭糖，更是冰清玉潔，世上無雙。我生平最喜歡吃綠豆冰粥，往往三四大碗，一瀉而下，甜在心坎，涼入脾胃，其妙無比，冰淇淋，荷

灑水。當退避三舍。

有時飯後，便約幾個朋友到玄武湖泛舟，那時後湖的小船，已經改良得十分輕巧，我在未辦大夏前，每天下午總要去划他半天，通常是十八個銅元，生入付一毛，夏天夜晚生划好，兩三毛不等。真是最便宜的享樂，最經濟的運動。自從辦大夏以後，白天是再也沒有功夫了，晚上也是偶然的事。然而抽暇一遊，趣味勝前！那鬧熱的湖面上，大小船隻，不是相競賽，便是在爭逐，大的搖搖擺擺，小的急急忙忙，像白鵝浮水，像蝴蝶穿花，煞是好看。那幽僻的湖面上，扁舟飄盪，耳鬢廝磨，那荷花深處，蓮葉叢中，唧唧噥噥，更是動聽不絕。

最有新聞性的要算是「湖匪」的出現，湖匪一名是新民報起的，當初我也以為是像太湖中的湖匪一樣，水上剽劫，出沒無常，行旅裹足，官家徬徨。後來每天看見新民報刊載湖匪活動的馬路無綫電，又每天看見描寫玄武湖的盛況，知道此湖匪必然不是彼湖匪，而是一種掠熱黨無疑。於是又約了幾位好事的青年記者專門去採訪此湖匪打家劫舍的新聞。

大概是「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緣故，京都裏的少爺們和小姐們錦衣玉食之餘，無事可爲，就乘着消暑美名，到玄武湖鬧一番，起初是同一校的男學生的船追女學生的船，那不過是鬧得玩的，不料有些學生就觸類旁通，對不認識的女學生也追逐起來。此風一開，有如虎列拉的不脛而走，無賴子弟，競相效尤，對只有女性的船隻一律模仿起來，膽小的自然不敢再不跟男性來，胆大的或是天真或是浪漫的，偏不顧忌湖匪，反而來嘗水花漿聲的滋味。也有好些真的成了「朋友」，前幾夜是羣相競爭，後幾夜已變了單獨行動。因徐商品化的女性。消息到後，竟捨秦淮，另闢市場。真是一篇大大的黃色新聞。舊同學世此衛兄繼任朝報總編輯，爲了朝報的銷路，要我寫一篇以這鬧動一時的「湖匪事件」爲背景的中篇小說，我在幾次深刻觀察之下，寫成四萬五千字，篇名就叫做「湖匪」，以每天一千五百字的篇幅分載一個月，據說平津川漢的讀者，竟有信來捧場，當時文風的澆薄，也可從自己的筆下窺測。

可是好景不常，大夏晚報兩個月後，經濟發生嚴重問題了！使我再也沒有這些閑情逸

致，寫小說，玩風景，連大副刊上的「王大可別傳」也斷了下來，原因是一千二百元的起馬本蝕光，發行廣告的收入相差尚遠，抵不了開支。我自己沒有多的錢可墊，一部份股東只繳了一百元，另一百元因意見關係不肯再繳了，添新股不是我個人所能作主，借錢又犯不着用我個人的名義來借，預算每個月至少要差三四百元。念頭轉到宣傳部身上，因為他對南京的報紙，那時每個月都有些資助，股再為辦「大華晚報」時，每月就有兩百元的補助費，我以為只要開口，總不成問題，何況大華的兩百元，早已停發，現成有筆錢可墊空缺，不必辦事人操心，不料遞了呈文以後，如石沈大海，渺無消息。此路既然不通，也就只有另想辦法。其實照我那時的預算，從七月到九月每月平均只差六七百元，從十月到十二月只差三四百元，第二年起收支便可相抵，因為廣告繼續增加，發行批價繼續提高，只要能挨過二十五年，一切便不成問題了。這些差額，本來問題也很少，假如是我獨辦，幾百元一月的小事，我縱然是個窮措大，借錢的路還多，不然把老家的祖傳破房子賣了，也可維持他一年半載。若是普通的情形，大家開個會，加錢也好，加股也好，乃至公開借債

也好，決不會眼見得蒸蒸日上的事業，祇差半年錢，就忍令窮困。無奈因為林君的職權削去後，心中異常不快，趁着無事可做，天天跑到三兩個僅僅乎出了一百元半股的股東面前，造作蜚語，那些人對我本無深交，看我獨個兒負責，又如是熱心，不明白我渡日如年的痛苦，我一天十幾小時的疲勞，滿以為此中有好處，所以獨攬大權，也就順水推舟，相信林君一面之詞，對報社採袖手旁觀主義。我幾次向他們提備忘錄，他們每次以「暫時偏勞」四字相敷衍，不肯提供有效的意見，不得已我只有召開報務委員會，這是第三次報委會，我報告了從林君解職到最近的社務狀況，並說明目前經濟的小小困難和前途的平坦，希望一部份未繳清股款的及早繳清，再拉幾個朋友入股，以便維持到年底。

一位鷹毛扇式的人物，便開砲打擊我，先是張大了嘴一笑，再從他那白金邊的平光眼鏡內，瞪起眼珠，向大家看了一眼：

「好吧，我們先請稽核組審查一下這兩個月來的賬目，看看有那些可以緊縮，萬一不夠開支，我們再談補救的方法」。

有了稽核組，審查自然應該，可是此人的動機，明明是污辱的方法，大概聽了林君的胡言，以爲我在作弊，所以想用這個方法在朋友面前出我的醜。我立刻把收支賬目及其羣據存根等交給葉敬持君，請他審查，我早存戒心，所以在召集報務委員會時，準備好了這些站在友誼的立場不應該審查的材料——雖然有審查組，但究竟不是一個公司。葉君審查完畢，笑了一笑：

「收支賬目沒有什麼錯誤不當——實在，以一千四百元辦了兩個月日出兩張的報紙，倒是個新聞」。

這幽默的諷刺，明明對着這些不顧事理友誼的人。全部十二個股東，可以說都是我的朋友，然而繳清了兩百元股款的多數者，神智清晰，未嘗想入非非；反是一部份僅僅繳了一百元的，斤斤較量，對自己一錢如命，對人家妄加猜測。天下事也許這就是個定律。

對於我前面的提議，繳清股款，本是義務，但應繳清中多數是不顧事理者，他們拿「沒有錢」三字搪塞，究竟我們是個無所爲的集團，有誰當真來責備他們，用決議的形式來

強迫他們，不繳也只好聽其自然。後半節提議呢？有人暗示這十二個人已經意見不一致了，再這些朋友來，也許會更不一致。實在，所謂朋友，差別也太大了，幾個人以上的朋友集團，很難使水準劃一。何況，「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朋友也太多了。

於是又有人提議，希望由我跟一些南京辦日報的朋友們合作，他的妙法是請日報主持入拿印刷做新股，理由是南京所有日報的機器在白天全空着，爲了發揮機器的效用，應該白天印晚報。對於我們呢，假如這樣做得通，最大的只是紙張費、薪水、稿費、雜用、租金等究竟有限，以廣告發行兩種收入來抵銷，毫無問題。這提議博得全體贊成，我也無從反對。究竟人家出力總比自己出錢容易接受，結論自然授權於我。我想到我與「大夏晚報」原分不開，倘若這些人全體要退股，這杯苦酒只有我一人喝，無法不接受這個決議，也可以說是一種勸告。

林君翻着灰色的嘴唇皮，無話可講，他深感沒有一種方法再提出來跟我爲難。其實上面的決議明明也是個難題，這次的討論，實際上可謂並無結果。

我開始執行報委會的決議，先從中央日報入手，我把不應該讓機器每天空着二十小時左右，只用三四小時的「合理化」的大道理，向程滄波先生陳述，要求他幫助，把他的輪轉機在白天分出一些時間代印大夏晚報，而將大夏作爲與中央合作的產物，藉以擴大宣傳的效能。滄波沒有理由拒絕我，只說此事關係中央日報的整個行政，不但需要詳細考慮，而且也還要得中宣部的同意，才能照辦。我知道這件事沒有像報委會諸人想像的容易，只好作罷，不再進行，但我又想中央日報是個機關報，自然比較難些，如果跟商辦報紙商量，或者還有希望，於是我又轉念頭到同鄉王公毅君身上，立刻上五台山他的公館跟他商量，我們一面吃飯一面細細地談，他原則上接受了，辦法却需要詳細考慮，他最注意的一點說我們人多口雜，怕惹是非，這點我很佩服他的經驗和識見，要是我早知道所謂朋友切不可涉及金錢的話，我發起「大夏」的辦法，也就不如此之天真了。公毅主張先由我收集股權，把大夏作爲我一人的產業，再和他合作，他答應拿出大筆資金，發展大夏，印刷自然不成問題，用平版，他有成賢街的「南京印刷所」；用輪轉，他有新街口的益報印刷

都，我很興奮，大夏業務上的前途，有公發這樣幹練的人幫忙一定很光明的。鑒於我自信有把握，要想追上朝報，無論新聞，評論，副刊，只要經濟充裕，都不成問題——那時朝報是南京出色的小型日報，每日出版三小張。

臨了，我答應他收拾殘局：他答應我草擬發展計劃及合同，於兩星期內完成各人的使命，籌備改組。我滿以為從此大夏晚報可以起死回生了。不料二十四小時後，第二天的中午，朝報突然起火，驚動全城，幸而新街口地處城中心，公發平日交際又廣，救火車快，幫忙的人也多，沒有全部焚如，但鉛字既完，機器受損，紙張傢具燒去又不少，損失自然也大，幸虧有成賢街印刷所，否則第二天也無法出版，公發經此打擊，對於兼做晚報的心，頓然完了，我也不好再去麻煩他，自承晦氣而已。

過了幾天，鼓着餘勇，又跟陳君銘德商量，因為新民報搬新屋，添新機，正在力圖發展的時候，而且銘德爲人，小心謹慎，穩扎穩打，假如他肯合作，大夏前途也一樣光明，但是因爲「小心謹慎，穩扎穩打」的關係，他雖未始不聽容，而又不肯慨然答應，他最使人

動聽的話，他說：「這一向新民報已覺得發展得太快，因為除掉整頓南京新民報，我們還在重慶創立一個分版，如果馬上再辦一個晚報，實在太引人注意，律以中國的道理，不可如此銳進。你的提議，原則上我接受，而且我同你的交情，也應該幫你的忙，不過我希望你忍耐一些時間，我們慢慢再談罷」。這話他很有深意，而且當時南京的環境，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何況他態度十分誠懇，絕對不是敷衍。

到此，我已經碰了三個釘子了，我不預備再去撞木鐘，但是中秋節快要到了，眼見得要是沒有辦法，會過不了節，我只有再召集報委會，把接洽失敗的情形告知大家，希望大家速定辦法，以免秋節關門。

一部份早存成見的股東，態度絲毫未改，開會時顯然形成兩個壁壘，一方面是以林森會出頭的拆台份子，彷彿報館愈無辦法，我個人愈痛苦，他們愈快意，說風涼話，袖手旁觀，惟恐局面不穩。一方面是整心維護報紙，同情我的陸舒農、陶林英、蔣君，他們認為大家都是朋友，必須團結互助，討論的範圍，應以如何維持報紙為目標。實際上拆台的人並不

多，如果用普通會議的方式，一切取決多數了事，何用麻煩，只是大家都是朋友，而且大多的集團有點非驢非馬，當初的動機大家是幫我的忙，後來有了報委會又不能由我一人作主，可是多數人並不重視法，因為既非公司組織，也未嘗向主管機關立過案，但多數人儘管不重視，少數人却大可利用，振振有詞，若是真的講法，那麼一切憑決議，多數的意見自然可以壓倒少數，無奈正因為多數不願利用法來對付少數，所以一切無法採取有效的步驟，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解決一切。也因此少數人得以憑藉這種形勢採取不合作態度，儼然成爲孤立派，使我們這個不講法而又不能不民主的會議，再度陷入僵局。

具體的說，大家爭辯了半天，孤立派第一不肯繳清股款，第二反對加新股，第三反對借債，我說：「這樣豈不是明明要逼倒報館，只要大家贊成，關門我也同意」，孤立派却反對關門。於是我們又提議：「那麼就頂讓給人家，或者改組，你們幾位退出，讓我們另想補救辦法」，孤立派又不肯。陶君林英氣極了，嚷道：「這樣也不同意，那樣也不答應，你們來辦，我們退出，好不好？」他們面露雲色，這一下他們的真意我明白了，原來

他們對於報紙的前途並不估低，只是要他們自己來幹，所以才取這種迂迴戰術。但我因多數股東是我個人出面拉來的，他們對於新聞事業並無多大興趣，參加股資，完全是我個人的交情，現在報紙在外表上蒸蒸日上，實際上的經濟問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爲了兩三個人的意見，弄得走頭無路，如果讓給他們，我個人的損失自然不必提了，這些朋友的股款，似乎不能不退還，因此我提議，「只要你們退還多數人的股款，我也主張我們全都退出，由你們接辦」。

不料孤立派又發出毫無道理的言論：

「你們的股款，該早用完了罷？根據總經理的報告，還虧着不少債哩！」

「這話太不懂報紙的特性了，報紙不是普通的商業，月結月帳，年結年帳，純粹以利潤做事業的標準，報紙是賣「牌子」的，所以通常一家報紙的讓渡，移交時儘管無分文現款，或或無一件生財，可是受盤者非準備一大筆現款不可的。曾經辦過「廣州民國日報」的陸君舒農，這樣駁斥。

「要我們退錢給你們，那我們也不幹」，林森會說，這就是說又沒有結果，白白地爭辯了一場。冷靜地一想，真如小學生吵嘴，毫無價值，我們這一羣，無論積極派也好，孤立派也好，總究缺乏丈夫氣。連我自己也在內，我覺得我個人尤其無能，顧情顧法，既不敢得罪人，又無法打開僵局，前瞻後顧，進退失據，以致同情我的受累受氣，反對我的肆無忌憚，因此我又覺得我是一個適宜於當編輯不適宜於做經理的人。

會議既無結果，大家一哄而散。關門，既然到最後關頭，關門以後的債務又無法善後，不關門，會議毫無結論，一切責任自然又落到我一個人頭上，我固然無能，做事少魄力，無決斷，但我從小好勝，不肯隨便失敗，假如一聲關門，這些朋友們最多犧牲兩百塊錢（兩百塊錢現在想起來恐怕要笑死洋車夫）我的面子却過不去。因此我決計不顧一切，獨自幹下去，反正這些合夥的朋友們既不用民主的方式共同決定一種補救的辦法，我只能當作他們是放任權利和義務論，也就不能不採獨裁的態度，其實這種獨裁說來也可笑，我一個人東奔西跑在師友面前用個人名義借了一批錢，我自己又到老家插了一些出來，苦若

地渡過中秋節，償付了中山印刷所的欠債，以及薪水，稿費……所以這還是敵同鄉阿Q式的獨裁。

我記得一位替大夏畫漫畫的年青畫家，在我欠了他許多稿費而他無法生活時，曾經留給我一個便條，上面寫着前人兩句詩；

「一家盡在西風裏，九月寒衣待剪裁」

我湊其得比不能維持報紙還利害，於是我決心奮鬥到底，每天十四小時的工作，我減少職員，自己兼理；我少用外稿，自己填充；我厚着面皮，四出拉廣告，這樣一直維持到雙十節，然而那孤立派的出面人林森會，閒着無事，不是上報館噲噲，便是到家裏麻煩，我整天辛勞，愁柴愁米，已經不能支持，再加上他莫明其妙的糾纏，實在影響我的精神，連做夢也看見他那陰沉沉的面孔和厚厚的嘴唇皮。

雙十節各報都預備出特刊，大夏不能落人之後，準備出三張，把握住兩個特色，第一搜羅辛亥革命時各種珍貴的史料，附以銅版；第二計劃一個動人的三色封面。史料多從黨

史會抄來，封面我自己造意，請畫家梁鼎銘君着筆，中間是蔣委員長演說時的堅決姿態，以東亞地圖爲背景，委員長的拳頭剛巧落在扶桑三島之上，而兩隻英威的眼睛又是東向落着。封面的四邊全畫以大炮，飛機，坦克，軍艦。這設計有人勸我，謹慎發表，恐怕落了新生週刊的結果。但我頗自信，不會有問題，因爲委員長的肖像，地圖，軍器，分開亦各個獨立，並無多大意義，合起來又無文字說明，日本人將用什麼藉口，來挑剔我們？但實際上凡是中國人都看得懂，肚裏明白。雙十節那天天氣十分好，委員長發表的告軍民書裏面，對日寇把持華北的野心，又暗示得很清楚，所以報紙一出，真是萬人爭閱，對於那一隻鐵拳壓在三島上面的表示，十二分興奮。明故宮的飛機場上正在檢閱江蘇全省童子軍，我特地多印了幾千分，派人去散，這對於血氣方剛的少年人是一種如何的激動呀！

事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辦的「中外評論」，對大夏晚報雙十節特刊下一個批評：「大夏不像其他報紙，對於雙十節特刊的封面，視爲廣告的好篇幅，他却犧牲這筆收入，刊登一幅富有國家意義的圖畫，引起閱者的重大注意，這是值得稱道的……」該刊且

把這封面製成銅版，載在文內。可是當我籌備雙十特刊最忙的時候，我的妻子正病在鼓樓醫院，我爲了特刊，整整三天沒有去看她，幸虧她病有轉機，否則，我將抱憾終天！

不久，蔣委員長生辰，我們又出了一個特刊，然而不久，國內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了，並且震動了世界，大夏晚報又進入了新的一頁。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十一點我正預備睡覺，忽然友人某君來電話，報告西安發生重大事變，這當然令人異常震驚，不過在我，地位與工作，無出門的必要，所以接了電語還是上牀睡覺，可是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我對實際政治雖已多年淡出，不加顧問，可是這件事情上關係國家的前途很大，我儘管不再問政治，但我究竟還是一個國民，這樣的國家安危所繫的大政變，不由得不使我思潮起伏，無法閉眼，我從黨改組以來想起；從北伐以來想起；從容共以來想起；從清黨以來想起；從九一八張漢卿的不抵抗想起；從張漢卿壓迫我個人想起，疊疊重重，千迴百折，矛盾怪異，不可究詰的國內政治糾紛史，一時如電影快鏡頭似的紛紛飛過眼簾。一個曾經參加國家改造運動的人，在國家改造運動的工作千磨百

折之後，依然沒有成功端倪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個大風浪，如何不驚心動魄，感慨系之。

當時多數人是十分注意這件事情的，雖然注意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新聞紙的價值，在民國以來，抗戰以前是空前的被人重視，我既然在首都辦晚報，下午五點以後，首都市民最發生關係的，除掉一頓晚飯以外，自然要算看晚報這件事了，也可以說爲了這件事，我對首都市民實在盡力不少。中山印刷所只有六部對開機，平時已感不夠應用，事變一起，大夏晚報的銷路，向上突飛，六部機器，無論如何不夠用，從四點一直印到晚上九點，還是不夠供應，因此應付報販的工作，成了一件最大的痛苦，成千的小報販擠在碑亭巷，憲警怪我們妨礙秩序，報販罵我們不發報，到後來，毀門市部，毀辱職員的怪現象，層出不窮，我真是窮于應付。實際上批價是提不高，印刷工人的酒錢却跟着印數而上漲，於是越銷得多越賺不到錢，小報販對願主的報價，却從一分錢提高到「兩毛」，「兩毛」這個數字，在現在看起來是個可笑的數字，但在當年，上海的小報可買十二份，東方雜誌

兩期，坐黃包車可以從兩路口到朝天門，（重慶）便成爲一個可驚的數字，在中央黨部後面如馬家街這些地方，竟漲到兩塊錢，光是這件事便成了新聞，所以報館的工役和少數低級職員，也竟存利權不可外溢的念頭，發行一完畢，店門關上，也挾了一捲報上街叫賣，每日收入一二十元，正當一月薪水，皮鞋呢帽，解決了不少問題，可是也被人誤會報館發了大財。

報紙銷路好，不僅是市民注意時事，也是大夏的消息比其他晚報好的緣故，當時的南京，雖是政治新聞的總匯，可是政府公佈的異常少，想從一般消息供應機關中吸取材料是不可能的，所以日報上就看不見什麼純粹的新聞，大夏既有上海的長途電話，而上海的來源出自西京外人電台，所以大夏關於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的各種新聞比較迅速可靠，儘管新聞檢查所根據決策檢扣若干關係新聞，但是每十條中檢餘一兩條，也就耐人尋味，名貴異常。譬喻一般人最注意的是蔣委員長的安全問題，大夏在委座未離陝前，首先揭載了某一要人離開西京東來的消息，讀者當然明白委座的安全不成問題了，這樣寶貴的新

聞，莫說兩毛兩塊，就是兩百兩千，也不能說貴。

在事變未結束以前，我個人爲了仰翼如先生殉難事，異常悲哀，邵先生不但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師，而且對大夏晚報也多所贊助，所以迎櫬之日，加出特刊，我扶着邵先生的靈柩從下關到第一公園，經過碑亭巷口時，感慨特別多，也因此十二月廿五日，爲了文武百官俱有喜氣，忘却殉難先烈，黨國功臣，曾經在大夏大發牢騷，幸虧政府的民主精神還够，無何動作，若在某一國，恐已被清算，魂游地府矣。

我記得廿五號那天，天氣異乎尋常的和暖舒適，上海長途電話中果然報告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所天天盼望的好消息，那時已來不及印刷號外，使用大批紅綠紙分寫電稿到各處張貼，不久，正式官電也就到了，到處響起炮聲，我個人呢，又笑又哭，笑的是國家厄運業已解除，哭的是一代儒宗長眠地下。而且「西安」兩字對我實留下一最不安的印象，最敬佩的老師既犧牲於「西安事變」，最親愛的同學丘元武也犧牲在西安，凶手却同爲那一幫人！

事變以後，天下似乎又太平了，我也爲着邵先生之死，心灰意懶，打不起精神，何況報館的經濟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恰巧投機取巧的汪兆銘先生爲着想趁火打劫，從歐洲趕回來，現在形勢大變，在他看起來真是逆轉，可是有些人又不能不敷衍他，於是發起「迎汪」，南京市上貼滿了「歡迎汪先生」的標語，好在那時的五色油光紙也便宜，多貼些原不在乎，可是像大夏晚報這樣的個性，看來似乎又不順眼，於是來了一篇「迎汪」的短評，無可諱言的諷刺性是大了一些，汪先生倒沒有看見，一位企圖做宣傳部長的汪派名人，找到了好題目，除照送一份外，一五一十的條陳一番，於是我們這位千嬌百媚的汪常委，在繃着眉，捧着心，跨進這扇曾經受過衛生丸教訓的大門而首次出席某項重要會議後，便雙眉頻斂，香喘微微，從彩袖中抽出那份晚報，對着某些負責人說，首都的朋友歡迎兄弟真是萬分感謝，可是大夏晚報以如此的方式歡迎，却又十分遺憾！自然，站在應酬的立場，不能不讓大夏委屈一下，於是處罰停刊三日而外，對我個人又加以可笑的打擊。

我正好乘機卸責，於是又召集報委會，請大家辦理後事，反對派爲了「迎汪案」，也

怕接收，不再如從前的頑強了，一致推我決定一切，於是我跟中山印刷所曹志遠君商量，請他接辦，曹一直不相信我們無心再辦此報，也一直不相信沒有贏餘，他便提出與王公駿君相仿的條件，第一步要我集中股權，我便分頭與各股東接洽，大家都同意了，爲了曹君的第二條件是按月攤還我們的股款和債務，所以我便分立債據，交各股東，還債時間，反對派期近，朋友們期遠，股權既集中，這些股東們對我只有債權，便無報權，我便把大夏交與曹君繼續出版，這時已經是廿六年的春天，我在南京閣住了一些時候，便應上海華美晚報之聘，去滬工作，却又因爲華美的事並不預備長期，一切東西，全不曾帶走，何況滬寧的各種應用物件也很齊備，所以輕裝東去，有如作客。不料蘆溝橋事變起，戰爭突然全面化，上海又首當其衝，工作較前驟然重要，短期計劃反成長期，而京滬線上大軍雲集，更不應該搬運私人物件，所以除一切犧牲外，大夏全部存報亦化爲烏有。曹君於戰事起後，因白報紙來源缺乏，第一步縮爲一張，第二步縮爲半張，真是每况愈下，及讀至停版啓事，我這個創立人，實在是涕淚滂沱！

第五章 洋商牌子

華美的工作，正如天津商報一樣，又以總編輯兼主筆的姿態出現，是上海報界前輩與譚先生推薦的，可是一樣是客卿性質，除報面的言論新聞而外，餘事一概不管，也不能。報社在外灘九江路口沿馬路的房子，靠近二十一路二十二路公共汽車站，於我滬西寓很方便，也鄰近『大晚報』，『大美晚報』兩家同業。報紙的發行人是美國寇爾斯氏，際上他不過是背着『發行人』的虛名，坐領乾薪，偶爾有問題時跑領事館工部局。報真正權力操在發起的三個華人手裏，一個叫做石開泰，一個叫做吳半儂，一個是擔任總理的朱作同，他們原是某一時期『大美晚報』經營的伙伴。後來大美由張時旭接管，朱吳改辦華美。

華美發行之初，正值『兩廣問題』最嚴重的時期，上海不但是商業市場，也是政治市

場，政治動盪的時代中，上海的花樣最多，上海人好動，惟恐天下不亂，所以時局愈混亂，上海的報紙愈風行，又因交易所的關係，新聞時局金融三者關連甚密，華美爲了要在發行之初打開銷路，樹立牌子，對兩廣問題誇大其辭，聳人聽聞，所以一來就銷到兩三萬，那時朱作同輩可謂大抖特抖，然而好景不常，兩廣問題解決，國內波平浪靜，銷路一落千丈，我去的時候，那一個鐘點吐一萬份的輪轉機不到四十分鐘也就關了馬達。這和天津商報一樣，初辦時採訪汽車四大輛，外勤十六個，氣派超出平津任何報紙，當我到時，又值「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可是比起我那「大夏晚報」，規模究竟大多了，除那座輪轉機不算，還有電話總機設備，每個編輯室裏都有一架耳機，直接聽總編輯的命令，又直接命令工房。這於晚報的工作效率很有幫助；同樣，總經理控制排字，鑄字，澆版，印刷四房，廣告，發行，材料三部，也非常方便。可惜中國的報業僅發展到從機械中運用耳和嘴階段，還沒有採用「透視鏡」，從中央管理室巡視全報館的各部門，卽是還沒有從機械中運用眼睛。否則，一切

怠惰鬆懈，浪費等等弊竇，皆可立時用傳聲器警告，而報紙也就容易上軌道了。

但在人事和經濟方面，却又非常薄弱，這並不是像我那「大夏晚報」確乎是沒有錢，才陷入苦惱；實在是主持人公私不分，經營無道的關係，因為華美當時的狀況發行雖不及「大晚報」而廣告的收入還足以抵補開支。只要大公無私的做去，並不困難；無奈主持人朱作同海派作風過重，揮霍太甚，有兩個以上的公館，還是每天尋花問柳。跳舞，賭錢，酒食爭逐，當然更是應有之「交際」。所以一天收入，供他個人半夜揮霍還不够，那有錢多用人，多買好稿子。聽人說小職員的薪水欠到十三個月還未發放，其餘凡可欠可拖的賬目，未有不盡量拖欠，因此每天出報後坐在經理室門外討債的諸色人等，竟和大門口批報的癩三一樣多。然而朱作同於收齊這些癩三的報款後，坐着他那自備的綠色汽車，揚長而去，不知所終，枯坐在經理室門外的債主們，依然枯坐着！

後來知道連那部明精牌輪轉機的款子也未付清，八一三後，明精方面急得要命，每天派職員坐索十八元法幣【合同規定每月攤還五四〇元】，三年分攤，共一九四四〇元。一

次付清時僅一六〇〇元，我以為妙極，同時却異常佩服那位每天枯坐一小時，替公司索價十八元的西裝少年。

我每天的工作很清閒，早晨讀書，飯後看報，看了日報就以最重要而尚未經日報評論的新聞，作成評論，中飯後帶往報館，到三點鐘看完新聞大樣又搭汽車回滬西，不是到顧家宅花園散步，便帶了小孩去貝當公園運動，晚上寫些文章，也少出去應酬，和每天十四小時工作的大夏時代以及放浪形骸的商報時代大不相同，不過工作上倒也衝鋒幾次，如同揮擊虹口日本電影院放映辱華影片，捕房取締外灘公園青年集體唱愛國歌等。可是縱然有聲有色，比之於過去十幾年的衝鋒陷陣，遭受「老西」「小張」等的緝拿壓迫，就不可同日語了。這還是我的火氣衰退，還是「天下太平」「邦有道」，我自己也無從判斷，如其說天下太平，而使我這枝二十年如一日的禿筆無用武之地，但是又偏偏好景不常，一聲砲響，蘆溝橋的烽火又作了！

蘆溝橋事變到政府宣佈「最後關頭」以前的一個階段中，極像九一八，一二八，長城

之戰諸役；敵人是肆無憚忌，我方是忍辱萬端，人民仇恨，輿論忿怒，此刻的上海與當年的平津，並無分別。自然，我的言論態度跟九一八以後在天津一樣。我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情緒上有一種根本的反應，就是這樣不斷的欺凌壓迫，如其妥協以偷生，毋寧決裂而戰死。國家大事，固然不可兒戲，當政者的措置，又不能不十分謹慎，然而我們究竟是黃炎子孫，東方大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兩千年燦爛的文化，從來異族侵凌，我們沒有十分的忍耐過，從來暴力壓境，我們的種族文化也沒有真正的消滅過，我們何所畏懼？固然我們現在是工業落後軍備落後的國家，與現代武器的暴日決鬥，是一樁極大的冒險，可是我們已到這步田地，只有拋棄利害觀念，把握人格觀念，為祖宗子孫爭一口氣。萬一戰敗亡國，也是雖敗猶榮，死而無憾。所以我的言論根據這個基本觀念，和天津時代並無兩樣，同時華美的銷路也和當時商報一樣，因為言論和輿情一致，突飛猛晉，起死回生，門口批報的癩三多如過江之鱗，擁塞不堪。那位總經理深恐日本浪人對付他，除自己佩帶手槍兩枝，又跟上一位保鏢，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依我看法，自衛而外還有「自威」的

作用，也是營業好了，多化點錢不在乎的意思。可是明精公司派來的那個西裝少年每天還是祇拿到十八元，據說朱公館弄堂口的攤子上，香煙賬依然拖欠三四節，並無清理希望。

終於，政府宣佈「最後關頭」了，這一決定，國內外所有黃炎子孫，興奮達到極點，國際間也驚訝不置。平漢線上枕戈待旦，箭在弦上的大軍，如潮水般地向前進，一鼓而下豐台廊坊，不由得不在每個角落裏的中國人同聲喊出「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當我們接到電報時，才下午一點多鐘，距離出版還有三個點鐘，這叫人如何忍得住，於是我們動員全體編輯部的人，分別用大紙，寫壁上號外，派人到外灘，四川路，九江路，以及愛多亞路的重要地點張貼，副經理吳半農君又買了大批砲竹，親自在報館門口燃放。這樣，立刻驚動了附近市民，報館門口，擠得水洩不通，幸虧愛多亞路不像南京碑亭街那麼狹，還沒有妨礙交通。

這一天明精輪轉機似乎特別賣力，吐出空前的報數，散到每條街，每個弄堂，自然也

到了關北，虹口楊樹浦……到深夜，牆三們還壓着喉嚨嘶叫「夜報……夜報……」。

從政府決心「應戰」起，上海就進入緊張狀態，而且詭跡之盛，九風十雨。到了虹橋敵水兵案發生，膽壯的磨拳擦掌，準備廝殺，膽小的也有惶惶如天禍臨頭之感。虹口一帶向蘇州河以南搬家的車輛如潮水湧來，直到八一二下午還是源源不絕，移動的人數在七八萬以上。那天一早知道從蘇州開到大場，真如，吳淞，關北的我軍數最可驚。這是以實力對實力的好方法，你藉口中村事件開來兵艦三十六條。想以武力威嚇人：我陳大兵在我的國境上，看你如何？這一着實在使敵人意外，那是可以拿我親見的情形證明。

我到報館，空氣十分緊張，許多人議論紛紛，都認為有立即開火的可能，工作完畢後，一位大膽的青年願跟我到虹口去看一看，我們就在四川路口搭上二路公共汽車北進，車上空得異乎尋常，除我們兩人外，只有幾個虹口的日本商人和一個日本老太婆，板着面孔，似乎有所打算似的，反之，那北來的二路車却擁擠得不堪，這個對照很顯明。車子開得很慢，四川路南段本不寬，最後一批搬家的人又擠滿了馬路，黃包車，老虎車，卡車，

紛獲得準確。派員捕魚也無法維持交通。經過了四川鐵橋遂却頓然清靜起來。蘇麥店舖已在不
橋板保存的是半開門。到也西川路廢棄了車。靠在左邊轉過去。其本陸戰隊本部門前滿佈
兵。已禁止通行。只得向左邊溜去。先會從楊樹浦敵艦上下來的軍士兵已一批一批地
此地從卡車載到了。那路上的軍用品堆積凌亂。陸戰隊面色倉皇。當初顯然沒有短時間
登陸的準備。爲了我方的準備充分，逼得他弄假成真。這條寂靜的四川路。又忽然熱鬧開
了。只是形態不同。路旁已佈崗。鐵甲車開始巡邏。我和這青年記者周慕不能不撤退了。就
坐着最後一乘南開的三路車過橋。不久，橋畔便架起鐵絲網。敵人的炮聲在遠處響起。
就在那天晚上十二點鐘，敵人於草率佈防以後，在蘆草濱方面跟我們開了火，這就是
名震全球的「八一三」事件。一早起來，日報已滿載開火的新聞。公非租界法租界的
千千萬萬的同胞，開始動員。爲火線上的將士們担任各種各樣的後援工作，我也參加了上
海市民抗敵後援會。

八一四那天中午我照例從蘇麥店路坐着三十一路去報館，經過大世界，看見大世界牌

近擠滿了難民，大世界也改作難民收容所。那景象可以說開法租界的先例。一到報館便得一個消息：說下午有兩百架中國飛機要來炸虹口，炸外灘敵司令艦出雲號，這奇偉的新聞，會從來沒有用空軍和外國人打過仗的老百姓聽來，真是驚異不置。我在兩點多鐘就回辣斐德路，把這不十分可靠而又人人喜歡聽的好消息告知家人以及從南京鎮江撤退下來的親友們，他們都感到興奮。

那天天氣特別悶熱，天上滿罩着灰白色的雲層，我報完消息，便上樓去洗澡。洗澡間是臨着馬路的，又向北，入浴未久，果然聽得高射砲紛紛作響，伏窗東望，雖然看不見飛機，而彈烟朵朵，其密如雲，蔚為奇觀，一會兒有一架飛機向西疾馳，到了大世界上空，一連灑下黑物兩枚，隨即爆炸，烟硝冲天，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飛機炸彈的威力。爆炸時房屋震動甚大，大世界距離辣斐坊不算近，響影已經如此，大世界和附近地區恐怕已不堪設想。我穿了衣服出去，黃包車拒絕受雇，電車停駛，舊飛路的商店多關上大門，馬路上的行人扶着牆壁走路，慢慢的，傷輕的已帶着血跡逃回滬西，重傷的工部局載送各醫院，到太

世界：車毀屋塌？血肉模糊？這場慘劇，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輛從外灘西開的公共汽車也焦頭爛額，乘客無一倖免，我大大地捏了一把汗，要是我照平日回家的時間離開報館，多半就在這輛車上！

從八一三到大場失守，我天天在崗位上工作，把從前天津時代的忿怒牢騷算洗刷得乾乾淨淨，而淞滬三個月的神聖抗戰，也把我們過去口口聲聲所謂的「國格」提高到極點。大場的失守自然關係淞滬全局，却因為淞滬究在國防線之前，並不令人怎樣的氣沮，何況開北撤退時？又有四行孤軍有聲有色的一幕，於中國的面子，可謂大有裨益。

開北撤退，大火三日夜，又開我從來未有的眼界，我於撤退的第二天下午同一位朋友到滬西去看，新退下來的我軍正在構築工事，敵人似乎還在掃除戰局，沒有緊迫，可是飛豐公園底動物園中的飛禽走獸，却已有人在遷移，我們靜靜地躺在草地上，看敵機的飛翔偵察，彷彿靜候戰事來臨似的。果然，那天晚上敵人大砲已射到我們滬西新築的工事上，動物園中未及搬家的那些禽獸也一律如逃魚般地遭了殃。不久，又退到南市，敵人的砲彈

從法租界上空飛過，飛機又從法租界的屋頂上直下投彈。這使租界裏的同胞，感到最後一擊的快將不保。果然十一月二十六，神聖的國軍撤離南京，和租界上千千萬萬的同胞們告別了。

在南市大火中，租界上的同胞，真有如喪考妣之感！尤其敵人從滬西到滬東作了一次大規模的勝利巡行，租界的尊嚴為之掃地。大上海既陷落，好些抗敵工作的同事們，朋友們，紛紛離開了許多同業也自動停版。像民報、申報、時事新報、大晚報、大公報等。尤其是讀了天津時代的老同業張季鸞先生在大公報上的「一篇停刊辭使我雲淚不止」他那豐富的感情，動人的筆調，在這種低氣壓的場合下，讀了誰都要痛哭失聲。許多「華僑牌子」的新聞紙，既應停止發行，上海特區以內的宣傳責任，報導責任，自然落在我們兩家「洋商牌」的晚報身上。華美和大美——在滬戰期內，兩美的銷路本已超出戰前幾倍，現在豫區內的市民既無多大餘糧可看，大美華美便分別發行「晨刊」以替代原有各日報的編排。果然與敵人在大隴南撤設立檢查機關，周恩來華商「復報的新聞稿審查須檢查後始發

「敵」於是時報、新聞報等等皆淪爲「俘虜報」了，而對於洋商報則毫無辦法，敵人儘管陳兵租界四週，究竟還沒有跟英美宣戰，對英美市場無如之何，因此又出了幾家掛外人牌子的報紙，像由神州日報改組的「導報」，「文匯報」，「力報」等等，洋商報紙的紀載方法，一向對日稱日，不稱「敵」；對我稱「華」，不稱「我」，而外，別的並無分別，一樣斥責，一樣暴露，而且站在第三者，站在國際的立場罵日本，比站在我們中國自己的立場罵日本，還要方便，還要痛快，還要有效。所以敵人恨「洋商報」比恨「華商報」還恨，更礙於國際關係，無可如何，敵人又明知大美華美實際上是中國人在主持，爲了牌子關係，又無可如何，但是敵人總得想方法對付。

「敵」敵尤是嚇唬漢奸文人寫恐嚇信，「華美」，「大美」兩家先後接到不倫不類的恐嚇信，緊下幾十封，我們處置的方法，比對於不通的投稿文件還來得輕鬆，拆開來略做一看，便送進字紙簍，後來漢奸們果然惱羞成怒了，把子彈裝在信封裏，但這又有什麼希罕？子彈不是沒有見過的东西，在北伐時，整天玩着這些傢伙，如以用來恐嚇洋場老手們，誠

者有效，但來恐嚇見過世面的人，當然無效，於是花樣翻新了，冒充郵局，送來包裹，打開來，却是血淋淋的手臂或人頭，這誠然有些恐怖，但也只被人頭血手恐怖罷了，對於漢奸的手腕，並不發生恐怖，因此戲法又改換了，送來一籃上等水果，那却又太客氣了，我們是不敢領教，可也不敢待慢，請了狗的客，這位狗呢，似乎不受抬舉，忽然生起病來。

過了一些時候，敵人終於耐不住？就接二接三地從馬路上拋炸彈進來，除掉大玻璃窗連續毀壞，只有改用木板窗外，人行道上的行人，往往城門火着，殃及池魚，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工部局多派探巡保護。究竟在那個時候，日本人還未跟英國破臉，更懼美國。對於美商報紙，還是無可如何，我個人呢，爲了跟報館的意見不甚符合以及經濟上的原因，也想休息一番，倒不是爲了怕死，實在「華美」的品格比「大美」要差些，那就是說報館內的份子，有相當混亂，我既不是主持人，大權並不在手，我的主張也未必能貫徹到底，如其到頭來弄得非常混亂，不如我先抽身，反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可是同業朱醒公就首先做了上海新開界的烈士！我並不自慶保身，我只準備延長我鬥爭的時間罷了。我離開

華美後，奉中央密令，擔任了一點其他工作，幸喜我在離滬前，敵人始終不清楚，因此我在離滬前的自由，也還充分。

這時我住的地方，也遷移了數次，越來越僻靜。不出門時，關在家裏看書，尤其關於西北問題的書，一連看了幾十本，我料定西北在未來的中國，佔據重要地位，一個生長東南的人，不能不研究西北，也因此我的苦悶減少了不少。住慣錦繡河山似的東南的人，往往會有這種感覺，東南一破碎，天堂似的蘇杭一淪陷，以爲國家就完了，其實長江三角洲那麼小小的一塊地方在整個國家講，算得甚麼？

到了二十七年的秋天，奉命赴滬，臨行，很多新聞界的朋友替我餞行，就在大世界附近那個紅極一時的錦江川菜館裏，剛巧流亡在香港的「申報」，因爲香港吃不開，預備改掛洋商牌子，搬回上海來，金華亭君擔任前站，於漢口向中宣部接洽妥當後即回滬來滬籌備，趕上「歡送會」，席間知道我要到內地工作，就要我擔任特派員的名義，我欣然接受了，答應一路寫通訊，到漢口後發電。

不料到香港廣州後，其他的事情忙得不得開交，根本無心再寫通訊，到了廣州吃緊，我於萬分困難中坐最後一列車離粵，到衡山休息了幾天，漢口又放棄了，到漢口的目的根本不遂，又因為長沙大火，湘中形勢緊張，各處交通受阻，更要安排個人的旋局生活，可以說無心再聞這些閒事。

到重慶不久，果然碰到山東民國日報的經理莊仲舒君，天津商報的經理王鎮冰君，和其他京津京滬的許多老同業。快慰生平，可是上海大美的張時旭君，申報金華亭君等等，拋留在蘇蘇上和敵人拚命的一些同志，也終於換掉了他們的性命啊！

過了這些時候，友人吳雨聲同志，奉命赴滬創辦「正言報」和「中美日報」並肩作戰，繼續大美華美的使命，吳君從上海來電要我擔任重慶的採訪工作，我算又客串了一些時候。

重慶商埠的官商，

華美翁。奉中央命令，帶了一部兵艦，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夜 生 活

白報
瀏陽紙全一冊定價國幣
熟料 一元八角
一元六角
一元三角

著者 魯 莽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代表人 盧 逮 會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校對者 李洛珍

2/8/35

該社呈繳
82

276044

立獨